

这照片是上海县漕河泾镇民兵团设的班房



(内部参考材料)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十九)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五部分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

党羽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1)

一、加紧装备第二武装，预谋发动武装叛乱……………(3)

1. 上海市财政局党委负责同志揭发“四人帮”为武装叛乱加紧私造、私购大量武器装备的罪行……………(3)

2. 马天水在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五年度民兵装备预算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4)

3. 马天水关于动用地方经费大量私造、私购武器问题的揭发交代……………(4)

4. 马天水关于突击发枪问题的交代……………(5)

5. 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突击发枪问题的交代……………(6)

6. 马天水在民兵指挥部《关于武器分发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7)

7. 施尚英关于突击发枪问题的揭发交代……………(8)

8. 突击下发武器的“军械调拨通知单”照片……………(9)

二、疯狂地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9)

1. 马天水关于武装叛乱问题的揭发交代	(9)
2. 徐景贤关于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的交代	(11)
3. 王秀珍关于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交代	(18)
4. 王少庸的揭发和交代	(23)
5. 冯国柱的揭发和交代	(24)
6. 张敬标的揭发和交代	(28)
7. 李彬山的揭发和交代	(32)
8. 施尚英关于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的交代	(36)
9. 钟定栋关于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的交代	(40)
10. 徐景贤调动民兵的手令	(43)
11. 徐景贤写的指挥班子人员名单	(44)
12. 王秀珍关于欺骗群众的“战备”口径的记录	(44)
13. 徐景贤调动警卫部队的手令	(45)
14. 民兵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 部署反革命武装叛乱	(46)
15. “四人帮”党羽炮制的武装叛乱作战方案	(48)
16. 钟定栋关于炮制武装叛乱作战方案的揭发交代	(55)
17. 十个区民兵指挥部、五个民兵师兵力、武器统计表	(56)
18. 十月九日、十一日检查各区(师)“领导在位”和兵力落实情况 的值班记录	(57)
19. 开设秘密指挥所	(57)
20. 准备叛乱用的电台及联络文书	(59)
21. 费海荣关于开设电台问题的揭发	(61)
22. 准备叛乱用的武器弹药	(62)
23. 为武装叛乱准备的交通工具	(63)
24. 为武装叛乱准备的标语口号	(65)

第五部分 “四人帮”阴谋发动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十月七日, 中央通知周纯麟同志以及马天水去北京开会。这时, 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凭着他们的反革命政治嗅觉, 感到“情况异常”, 预感到末日来临。他们分析: 一、九月下旬张春桥、王洪文都说过近期中央没有什么会议; 二、周司令去中央开会以往都是由市委通知, 为什么这次中央办公厅直接通知; 三、马天水去北京后, 一反往常没有打电话回来。经多方打探, 又找不到“四人帮”中任何一个的线索, 他们与“四人帮”的联系被割断了。于是他们惊叫“不好了, 出事了”, “人家动手了”。“四人帮”豢养的这批走狗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发出了“困兽犹斗”的哀鸣。十月八日, 徐景贤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 决定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徐景贤写了“民兵二千五百人集中, 三万一千民兵待命”的手令。他们怕被“一网打尽”由徐景贤带领的一路从康平路转移到丁香花园指挥, 由王秀珍带领的一路先是到民兵指挥部具体策划布置后, 也是怕被“一锅端”又转移到一个招待所去指挥。十月九日上午, 上海民兵指挥部头头召开了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 紧急布置了武装叛乱的兵力和要求。会后, 由施尚英、钟定栋带领一伙窜到江南造船厂架起电台, 称为“基本指挥点”; 由吴立义、印玉泉带领一伙溜进中国纺织机械厂, 称为“预备指挥点”, 以便一旦基本指挥点被搞掉, 可以继续
进行指挥。十月十日下午, 徐景贤、王秀珍两人被找去北京开会, 留在上海的一群党羽群魔乱舞, 一片混乱, 有的主张“立即干”, 有的主张“要干, 但要等马、徐、王回来”。施尚英、钟定栋在基本指挥点里也狂叫“十年心血在于此”, 加紧了策划。十月十二日晚, 他们挂起地图, 标出三道防线和对付可能从江苏、浙江方向来的部队的六个口子; 制定了所谓“捍一”、“方二”武装叛乱的方案; 规定了口令、暗令, 并逐个检查各区(师)指挥部“领导在位、兵力落实, 社会动向”的

情况。在他们的策划下，有的区指挥部把机枪架到了房顶上，准备“一有情况就扫”；有的子弹压进弹夹，架在摩托车上巡逻；有的搞队伍登车、下车的预演；有的准备了钞票、粮票，也钻进了秘密指挥点。这时准备武装叛乱的活动非常紧张，一触即发。十月十三日马、徐、王回到上海。十四日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遍全市，革命的人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互相庆贺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树倒猢猻散。“四人帮”的党羽预谋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连同他们经营了十年之久的第二武装便“顷刻瓦解，一朝覆亡”，彻底垮台了。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批党羽在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的时候，歇斯底里大发作，要发动武装叛乱这决不是偶然的。当“四人帮”在上海拉起“第二武装”之初，他们就毫不掩饰地叫嚣要“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四人帮”在私下里对他们的亲信、党羽也非常明白地交代：“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他们一直在窥测时机，准备下手。一九七四年，他们借批林批孔之机，大肆放火烧荒，就妄图搞乱军队，并进行了以人民解放军为假设敌的所谓战备演习；一九七五年，私造、私购大量武器弹药，加快了装备“第二武装”；一九七六年四月，各地暴发了革命人民声讨、反对“四人帮”的革命怒潮，他们一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法西斯式的镇压，一面密令他们在上海的党羽紧急部署准备镇压的措施。一九七六年六月，毛主席病重的时候，“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又是暗示“上海有大考验”，又是突击下发大量武器弹药，准备武装夺权了。当“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感到“四人帮”垮台的时候，最后猖狂一跳，这是必然的。他们注定要失败，这也是必然的。十年浩劫，最后以“四人帮”彻底完蛋，人民的胜利而告终，这是难以忘怀的一段历史，也是党和人民与“四人帮”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为了彻底揭露“四人帮”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下面我们把“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搞武装叛乱的有关材料予以披露。

一、加紧装备“第二武装”，预谋发动武装叛乱

一九七四年以后，“四人帮”加快了对“第二武装”武器、弹药的装备，特别是一九七六年毛主席病重之后，“四人帮”指使突击下发了各种枪、炮七万四千余件，弹药一千余万发，预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1. 上海市财政局党委负责同志揭发“四人帮”为武装叛乱加紧私造、私购大量武器装备的罪行(节录)

动用地方经费，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加紧私造、私购大量武器。

对于民兵的装备，根据战备要求，总参每年都订有民兵装备计划，由财政部拨给上海一定数量的装备费。但是，“四人帮”千方百计地破坏民兵建设，妄图把上海民兵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反党分子王洪文多次叫嚣上海民兵要“自己武装自己”。他每次窜来上海总是叫嚷：“民兵的武器要抓紧制造，抓紧装备，抓紧分配”。马天水心领神会，卖力大干，大搞阴谋诡计，背着中央，加快步伐，私造、私购了大量武器。一九七四年以来，他们在国家拨给的民兵装备计划经费外，又私自动用大量地方经费造枪、买枪。据统计，一九七四年擅自增加了七百十八万元；一九七五年又擅自增加了五百五十一万元；今年他们更是变本加厉，竟高达二千零五十万元，这同“四人帮”，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是密切相联的。

他们私设生产武器的工厂和车间。一九七四年前，王洪文等人就在一个工厂搞了一个专门车间，试验生产半自动步枪。以后，王洪文亲自到这个工厂“视察”，指使马天水等人决定正式投产，每年生产五千枝。一九七四年以来共生产了一万五千枝步枪。王洪文、马天水还瞒着中央有关部门，又私自安排另一个厂每年生产全自动步枪一万枝。一九七四年以来共私制了三万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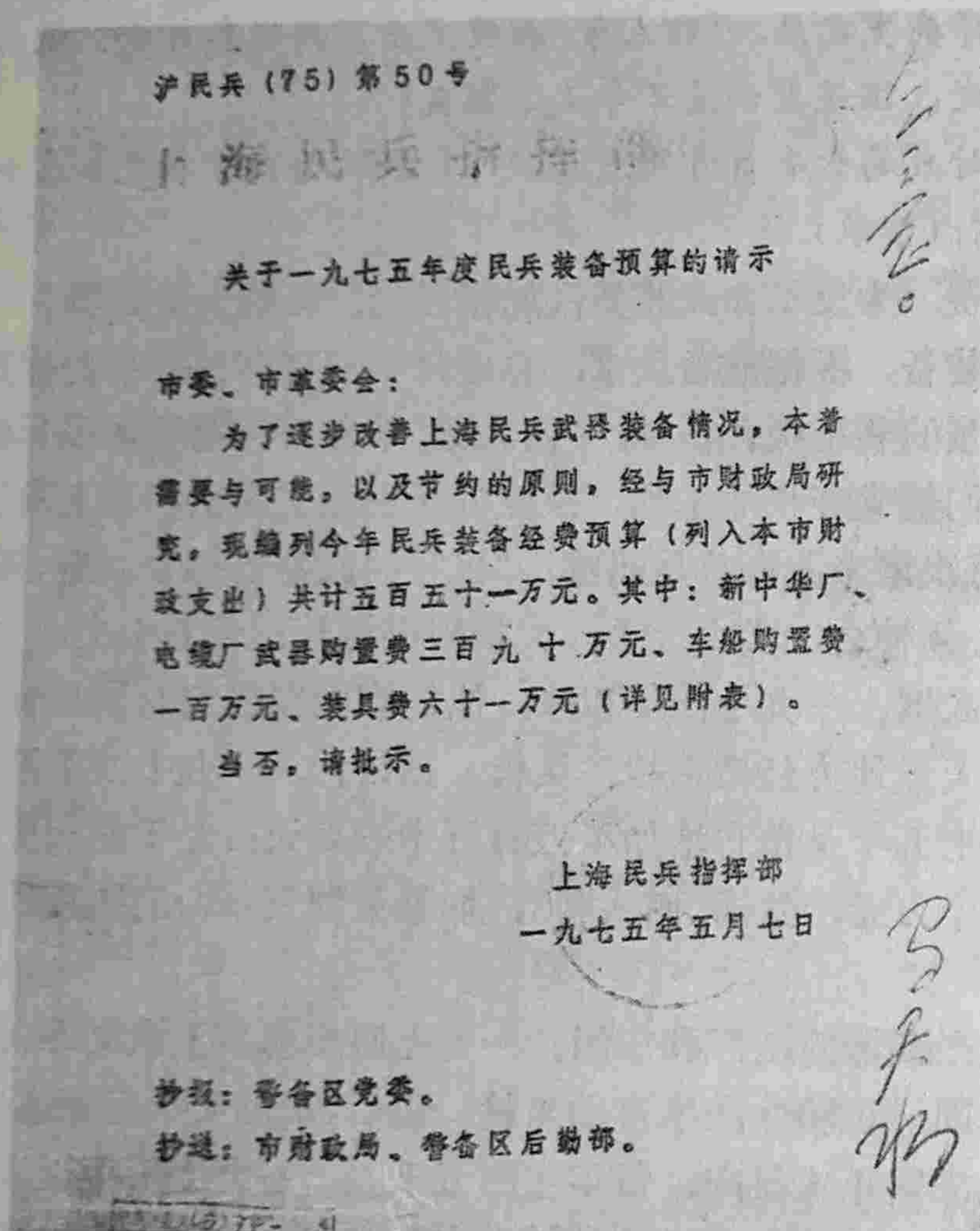
他们私购军工生产超产的枪枝。一九七四年底有五个工厂超产了步枪一千四百六十二枝，枪弹三百九十二万发。马天水等人不向军委有关部门报告，就从地方经费中拿出一百八十三万元，私自买了下来。

他们强行留下雷达指挥仪。一九七五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上海生产××型雷达指挥仪几十台，马天水、黄涛等人，竟趁机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不顾国家统筹安排，强行留下一些归上海使用，并威胁中央有关部门，说什么：不给，就不生产。强行留下雷达指挥仪十台。

(摘自上海市财政局党委负责同志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2. 马天水在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一九七五年度民兵装备预算请示》报告上的批示

这是，《请示报告》及“批示”的影印件：



3. 马天水关于动用地方经费大量私造、私购武器问题的揭发交代

关于“四人帮”分裂军队，篡夺军权，拉民兵队伍为他们的阴谋服务，我已作了揭发。交代这里交代我积极搞武装民兵的思想。今年七、八月份发枪不是偶然的。我在“四人帮”的反动思想灌输下，要武装上海民兵，加强上海民兵是一贯的思想。发枪弹武器大部分是经过总参后勤、南京军区同意的，凡同意的国家投资。王洪文为了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对民兵武器和装备抓的很紧，一直直接插手过问，对生产民兵武器，他一不经中央批准私自在地方形成两条武器流水线，作为“四人帮”生产武器的自留地。二是国家计委超产计划不经上级机关同意就捞来分配。每年由上海某某厂、某某厂两个厂生产××支自动和半自动步枪，同时，还由某厂专门造了一艘巡逻艇，支出××万元（实际造价要比这大得多）。民兵使用的雷达指挥仪器，造了十台，每台××万元。这样武装民兵武器的地方经费，大量增加，前年地方经费化了××万元，去年地方经费化了××万，今年地方经费化了

××万。这是和阴谋篡党夺权密切相配合的。每年报告我都按着他的黑旨意批了。今年，我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发枪？在我的思想里就是，毛主席百年以后，准备要保卫“四人帮”这个阵地。这个思想是我和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经常反动地议论主席百年之后会不会打内战、闹乱子有密切关系的，特别主席逝世前后，我们议论得更多了。这种分析就是搞阴谋。矛头是指向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指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

马天水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是影印件：

4. 马天水交代关于突击发枪问题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个发枪枝弹药的报告，我在七月三日就急于批了。到八月份我找民兵指挥部谈社会治安情况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为什么还没有批下来，我找办公室一问，才知道为大丰农场是否发枪事压了下来。我大批评了他们一顿，说大丰农场是否发枪事可单独处理，又批了立即发，将七万条枪都发下去了。为什么这么急，主要是今年以来特别是主席病重后，我们受“四人帮”的毒很深，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同志也曾议论过主席百年之后的形势担心万一发生内战和闹乱子，手里有点力量，这是极端反动的。

马天水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个发枪枝弹药的报告，我在七月三日就急于批了。到八月份我找民兵指挥部谈社会治安情况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为什么还没有批下来，我找办公室一问，才知道为大丰农场是否发枪事压了下来。我大批评了他们一顿，说大丰农场是否发枪事可单独处理，又批了立即发，将七万条枪都发下去了。为什么这么急，主要是今年以来特别是主席病重后，我们受“四人帮”的毒很深，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同志也曾议论过主席百年之后的形势担心万一发生内战和闹乱子，手里有点力量，这是极端反动的。

马天水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5. 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突击发枪问题的交代(影印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左右，我在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会议后，张春桥把我找到钓鱼台他的住所去。我向他当面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军队的一些重要情况，我的“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枝。”张春桥很注意地听，完全是默许和支持的。接着，张还对军队的问题为我们进行了出谋划策。回上海以后我跟马天水、王秀珍都说了。

徐景贤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左右，我在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会议后，张春桥把我找到钓鱼台他的住所去。我向他当面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军队的一些重要情况，我们“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枝。”张春桥很注意地听，完全是默许和支持的。接着，张还对军队的问题为我们进行了出谋划策。回上海以后我跟马天水、王秀珍都说了。

徐景贤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6. 马天水在上海民兵指挥部《关于武器分发的请示报告》及马天水在这个报告上的批语(影印件)

急

《绝密》
上海民兵指挥部(请示)

关于武器分发的请示报告

市委:

一九七五年度，根据国务院国防工办、总参、总后参字第10号《一九七五年小三线军工产品调整计划》、四参动字第33号《关于上海市留用一九七五年动员线产品装备民兵问题》、南京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司联字第9号文件精神发给的武器，以及上海电缆厂、新中华机器厂生产的武器，我们已收到入库的计有：六三式自动步枪二万一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万三千支；五六式十四.五的四联高机枪一百二十挺；六九式四〇火箭筒一千五百具；五六式轻机枪二百挺；六三式六〇迫击炮三百门。此外，六五式八二无后座力炮一百门(只生产九十九门)，尚未入库。

对现已入库武器的分发，主要是武装产业工

- 1 -

1976年6月29日

马天水

对武器的保管一定要严格认真负责并经常检查。当否，请景贤、秀珍同志审阅，并请警备区党委审阅。马天水

另还有二万多支自动步枪，既然上级已同意下发，我们应即下发，不必入库。又及 马天水

立即发 马天水

影印件原文

拟原则上同意。对武器的保管一定要严格认真负责并经常检查。当否，请景贤、秀珍同志审阅，并请警备区党委审阅。马天水

另还有二万多支自动步枪，既然上级已同意下发，我们应即下发，不必入库。又及 马天水

立即发 马天水

7. 施尚英关于突击发枪问题的揭发交代(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度上海民兵武器，根据国务院、总部和南京军区有关规定，于去年年底到今年一季度已陆续进库，我在今年四月初向王秀珍请示过要求下发。王秀珍说：现在主要是搞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武器慢一慢，以后视情再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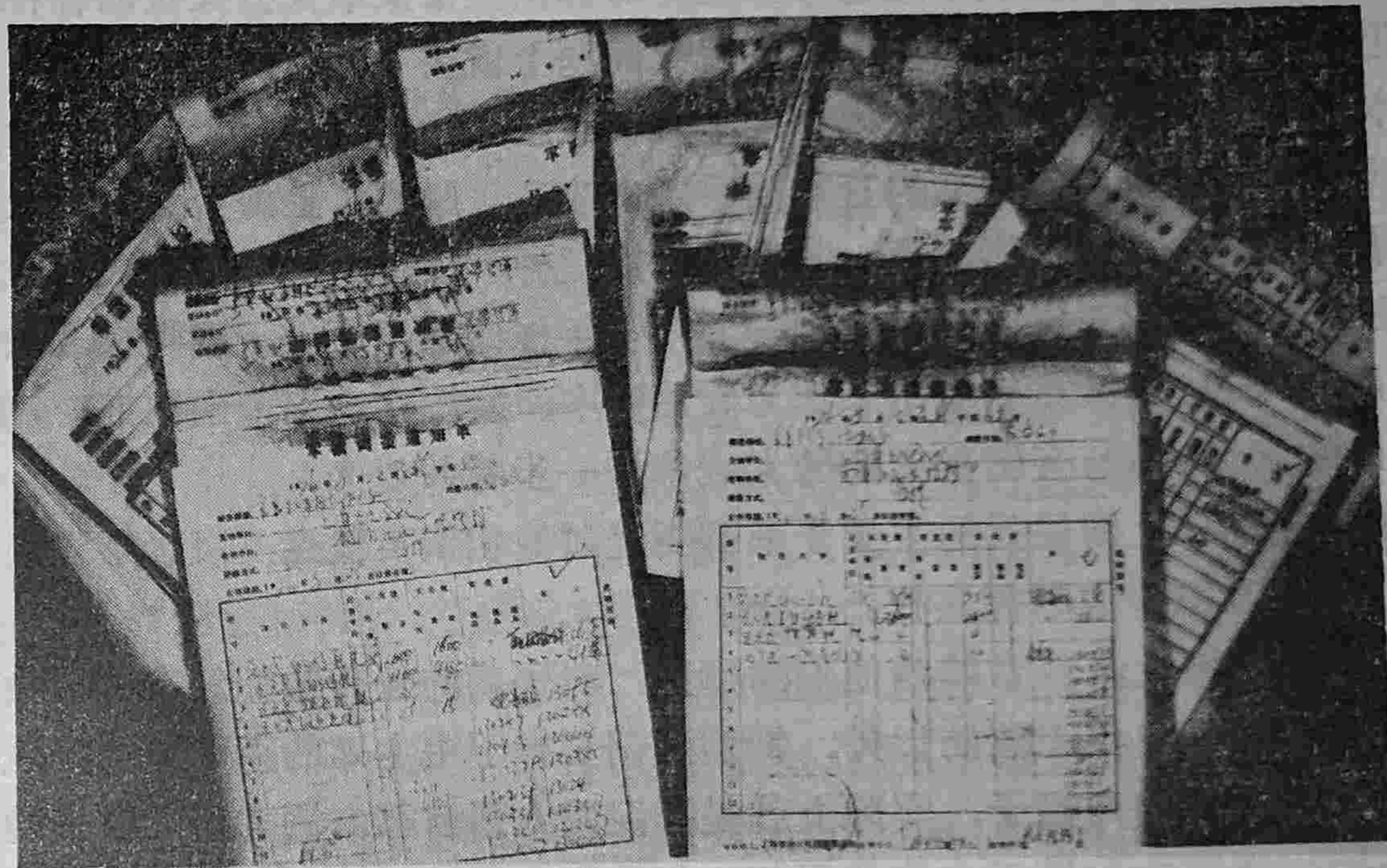
今年六月下旬一天下午，王秀珍打电(话)要我到锦江小礼堂，公安局薛干青，警卫处康宁一也在场，王秀珍问了薛干青和我，外交部通报传达后，下面有什么反映，薛和我讲不出什么(注：外交通报内容是毛主席已高令(龄)，不接见外宾的精神)后来王秀珍说，毛主席不接见外宾，这个你们可以想像的，我有些话在喉咙口，不好讲出来，你们听到社会上有什么反映要及时掌握报(用手抄)我们。王

秀珍讲了一段话后，我趁机简要地汇报了一下民兵工作，当汇报到武器下发问题时，王说：你们抓紧打报告上来给市委讨论。回来后，我们讨论后于6月28日拟了一个报告上报的，7月3日晚上9时15分左右，马天水打电话给我，马问了我报告上为什么全自动武器不下发，我简要地汇报了是李彬山副政委批的意见。马天水接着讲，全自动要全部发下去。我说，是否再打报告，他说你们发下去后，作一个情况报告就行了。8月10日晚，马天水找薛干青、徐成虎、关键、王克、李彬山、钟定栋和我到康办开会，我问了房佐庭关于武器分发的报告，马老催得很紧，怎么到现在还不批下来，后来房佐庭找办文的秦根富来，把文也拿来了，马天水就大发雷霆，训斥秦根富，为什么不抓紧办。马说，我早就批了，你们不看看这么重要的事给耽误了。马天水又把原来批的报告上批了立即发。并向我们说，你们明天就发，我说报告没批怎么发，马说，你先抄一抄，你们明天就开会，明天就发下去。所以我们于8月11日下午就开会布置下去了。到8月底前，七万

多件武器全部从仓库领出。以后我们向市委写了情况报告。9月9日搞战备时，大部分发到了基层。十月九日布置战备后，也有部分发到了基层。

施尚英 1976年12月11日

8. 突击下发武器的“军械调拨通知单”(照片)



二、疯狂地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张、姚、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十月七日中央通知马天水去北京开会，马天水去北京后一反往常，没有打电话给上海、徐景贤、王秀珍等预感到末日来临，自十月八日至十四日，他们利用“第二武装”，预谋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1. 马天水关于武装叛乱问题的揭发交代：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到十月十三日，上海发生未遂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不是偶然的，是“四人帮”蓄谋已久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上海的民兵是王洪文、张春桥一直苦心经营的。

他们到了中央工作以后，对上海的民兵一直是抓住不放的。特别是王洪文对上海民兵的武器生产和民兵的装备更是处心积虑的一直亲自布置，连生产武器品种都是他直接布置规定的。

多年以来，王洪文多次讲，上海民兵的武器各种枪炮要齐全，自动步枪、半自动步枪要尽快的发到二十万支以上，要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四人帮”对上海的民兵这样苦心经营，难道仅仅是为了抓好社会上的阶级斗

争吗？显然不是。他们这样苦心经营的真正目的是为篡党夺权，是为了妄图使上海民兵成为他们自己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江青、张春桥一九七〇年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曾流露出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去年九月还说，我担心的是军队，不是地方。他们早想篡夺军权，对部队经常采取又打又拉的各种阴谋手段，但是一直抓不到手。因此他们在民兵问题上就要下更大的功夫。

本来民兵的组织系统是直属地方军人民武装部管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上海的民兵经过张春桥、王洪文的直接插手亲自改造，脱离了上海警备区人民武装部的领导，单独成立民兵指挥部，归市委直接领导。从组织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第二武装集团。一九七三年张春桥又把一九六七年他向毛主席关于改造民兵的报告（毛主席并未表态）又重新拿出来作为政治资本，妄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搞“四人帮”自己的武装力量，妄图把上海的人武部进一步吞并过来。

“四人帮”对上海民兵的主要干部都要经过他们亲自挑选，直接培育，主要由他们的小兄弟和亲信掌握实权。

在政治思想上，经常灌输他们的毒素，对民兵的任务他们经常讲，除了抓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保卫国防以外，特别强调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以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幌子，实际上就是捍卫四人帮自己。因为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他们经常篡改封锁毛主席的思想，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代表，左派代表，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他们对民兵干部经常灌输对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敢于造反，去年九月王洪文在上海还对民兵干部讲，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有斗争，要有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要站得住脚等等，在民兵主要干部中中毒已很深，实际上从民兵主要干部来看，“四人帮”已把上海民兵看成是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已成为保卫四人帮的武装力量。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多年来，市委常委受“四人帮”的流毒也很深，四人帮当中王、张、姚既是中央代表，又是市委主要负责人，王洪文还兼上海总工会主任，我们一切问题都向他们请示报告，多年以来，我们把他们的黑指示当作圣旨一样贯彻，虽然对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感到有些问题，但是看不透他们的本质，看不穿他们的伪装，长期以来在心目中已形成以“四人帮”划线。至于王洪文有少数小兄弟更是互相死保。

今年以来，特别是毛主席病重以来，由于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受“四人帮”流毒很深，也曾议论过毛主席百年之后，会不会发生乱子和内战，所以今年八月份根据王洪文的黑旨意，急于把七万条枪发下去了。

再加上我在十月七日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时，开始思想不通，八日我没有亲自给家里打个适当的电话。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这种未遂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四人帮”蓄谋已久的必然结果。

马天水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2. 徐景贤关于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的交代：

专题交代我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严重罪行

我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要害是死保“四人帮”，以武力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不但同意调动民兵、军队，准备反革命舆论，而且有恶毒攻击华主席的反革命思想和言论。我如实交代如下：

十月七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去开会，我就感到突然。因为：（1）九月二十一日我在北京见到张春桥、王洪文两人时，都问过近期有什么会议，他们说没有。此事回来后和市委常委说过。（2）九月二十八日肖木来沪给市委常委传张春桥的话时，我们问他，说也没有会议安排。

接着，马天水告诉我和王秀珍等，这次开会，中办又直接通知了周司令，这是从未有过的。过去都只告诉一个主要负责人。这又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同时，王秀珍连续给王洪文在北京的秘书打电话，根本打不通。

上飞机前，我们约好要马天水的秘书抵京后来电话和我们通个气。结果因为他找不到王、张、姚的秘书，电话未来。

七日晚上，王秀珍找来金祖敏在上海办事的秘书，通过京西宾馆的熟人电话找到马天水的秘书，说尚在待命，会议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还有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等参加。

晚上十一时左右，我给文化部某某某打电话，他说原定八日带文化代表团出国，忽然接到华总理指示不出国了。我觉得一定出了大事，因为毛主席逝世时有些代表团还照常出国的。

半夜，我给卫生部某某某通了电话，她正在开会，她说没有什么事，不过《人民日报》的某某昨晚也打电话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十月八日，一早，王秀珍去张春桥老婆家，送张的儿子原定乘九点的火车上北京，张的老婆说打了一夜电话给张在北京的秘书，打不通。

于是王秀珍把我、冯国柱、张敬标找到康平路小礼堂商量。我们又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以及廖祖康、肖木都找来。他们分头给北京姚文元的秘书、姚的老婆、钓鱼台王洪文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服务员等打电话，又给紫光阁的某某某打电话，廖祖康甚至给八三四一部队值班科打电话，都不通。我和肖木再分别给人民日报某某打电话，他神态反常，旁若有人。我还给浙江、福建省的领

导打了电话，没有摸到情况。

最后，张敬标给马天水秘书打通了电话（当时马已经去参加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回来了，思想不通，影响了他的秘书），秘书在电话中情绪低落，说是“胃病发作”；廖祖康抢过电话，听后也是同样的内容。

我觉得应该亲自给马天水打一次电话，因为他在主持上海的工作。接通马的秘书后，我说我有极其重要的事要请示马老，一定要马老通话，他去请示后答复，马老不能听电话；我又问：马老究竟在不在？他答：马老身体不太好。我再问，你那里情况究竟怎么样，他明显地暗示：“我的老胃病重犯了。”放下电话后，经办公室了解核实，他没有什么胃病。

同时，我们收到警备区作战处的电话记录说，军委首长指示，部队战备工作转入正常后，发现有的单位有些松懈，请检查一下。战备工作不能松，仍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边防（沿海）防止内遣外逃。我们读了这份电话记录以后，大家议论纷纷：一级战备刚撤消，为什么又要加强战备，而且要防止“内遣外逃”。“老胃病复发”，是不是指老帅或某些军区的负责人动手了。加上警备区又来通知，说总政原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阅读现场会议不开了。于是，大家判定肯定出事了。当时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朱永嘉、肖木、廖祖康等人。

“四人帮”和我们的一切联系被割断了。由于“四人帮”的长期毒害，我凭我的反革命政治敏感性和上述的一系列迹象判断，觉得极可能发生了军事政变，而且已经把“四人帮”扣起来了。

午饭前，王秀珍约金祖敏的秘书来，要他下午随一架专机到北京去摸情况，约定最严重的情况暗号为“心肌梗死”。

同时，我同意了王秀珍提出的下午要找民兵负责人，王少庸提出的要找公安局负责人来打招呼；我还主动提出，下午要找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来打招呼。

午饭后，我休息片刻，从我家中书橱子内取出一九七五年初我写给张、姚的三封信的底稿，把它烧了。（此事已向领导报告另作专题交代）

接着，我们就和公安、民兵的负责人打了招呼。此前，王秀珍把部队的两个负责人也找来谈了一下。我找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打招呼时，给他们灌输了反动思想。我说了中央台通知停播的两首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某某突然不出国了。和人民日报的某某通电话时十分反常。在京三位领导都联系不上，又来了“老胃病发作”的暗示，可能出问题了。我谈了军委首长加强战备的指示，然后从我自己的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推理出发，我非常反动地说：苏修侵捷时捷克国家广播电台只听一个负责人贝利康

的指挥，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声明，根本不听苏军的。我布置新闻单位加强保卫，还说准备调民兵去保卫。我要他们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实际上想把舆论都控制起来。当时，我又找来《人民日报》研究，发现七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出现过“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所以最后我说，“还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下午五点多钟，由我主持召开常委、列席常委会议，把我们的反动估计向大家打了招呼。但因为怀疑军队，没有通知应该列席的武占魁同志（空军）和康庄同志（海军）参加。

晚上七时半左右，我在剧场里接到文化部某某某来电，说他给钓鱼台江青那个楼打通了电话，是服务员某某接的，“说首长身体好，现在不在家。”

我马上赶回康平路学习室，讲了文化部电话，廖祖康听了表示怀疑，他马上打电话到钓鱼台江青那个楼核实，接电话的是放映员某某，说服务员某某今天根本没有来过。廖判断刚才文化部打通的电话是假的。他又告诉了王、张、姚的三个电话号码，让文化部再打一遍，不久他们回电说都打不通。我又告诉他们打电话找马天水试试。

与此同时，金祖敏的秘书从北京打来电话给上海警卫处某某某报告暗号：“我娘心肌梗死”！大家都惊呆了。

接着，公安部某某某又电告，说刚才金祖敏的秘书曾经进过京西宾馆，后来在他那儿打的电话。公安部某某某在电话中说了三句话：“人员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最后，文化部某某某来电话：“马老不接电话。我们都病了，有病情。”

这时，肖木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

于是，大家议定再也不能往外打电话了，下一步可能要对我们动手。形势严重。

这时，在场的有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朱永嘉、肖木、廖祖康等人。

朱永嘉突然提出，“我看这次是某、某两个结合，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他是在会上把矛头首先直接指向华国锋同志的第一人。

大家听了都楞了一下。廖祖康同意朱永嘉的分析，并说：“8341部队是很厉害的，听某主任的，没有某主任指挥，一下子搞掉四个人是不容易的。”

朱永嘉又说：“他们先抓人，然后宣布一个决定，说这几个人反党。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象巴黎公社那样。”

大家都不响，我当时把这些话都听进去了，证明我的反动思想是和他们一致

的。

这时，大家都急着怕被抓去，怕当天晚上被一网打尽，议论要分两个点，撤出康平路机关。王少庸说白天问过民兵情况，很分散。有同志去问了一下民兵数字，值班的二千五百人，分在各厂，还有三万一千人可以待命（后来了解实际只有一万一千人）。王少庸又问：有没有一个团的力量形成拳头。这时廖祖康提议要把几个部队的负责人带在身边，我们同意了。大家催着快分散，由我执笔开了两个名单，分两个点：

一号点，设在一个招待所，有徐景贤、王少庸、张敬标、朱永嘉、部队的两个领导以及我的秘书等人。这是文的一路。二号点在民兵指挥部，有王秀珍、冯国柱、廖祖康以及部队的两个领导等。这是武的一路。在征求意见时，张敬标提出他留守康平路机关，朱永嘉也提出他去陕西北路经济组找几个人，准备舆论，我同意了。这时廖祖康又提出要把工总司的老造反头头集中起来，朱永嘉表示支持，说这样可以发动工人，我也同意了。廖祖康提出黄金海、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某某等人的名单（后来他们又加了汪湘君），我一一记下交给了王秀珍。这时，大家急于分散，我又给王秀珍写了一张纸条提醒：请民兵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人待命，加强值班，并立即派民兵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分手时说定，大家作好准备，最后听徐、王指挥。

于是大家一哄而散。一号点的几个人在学习室等部队的两个人前来。不久，他们来了，我也跟他们打了招呼。这时正好半夜零点，电台广播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听了广播，“四人帮”过去灌输给我的反动思想更为抬头，我进一步怀疑这两个决定，特别是第二个决定，我一听是要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我九月二十一日到张春桥那里去时，他还说过：“考虑不准备分别出五卷、六卷，准备先把有主席手稿的、经主席审定过的文章先合成一册出版，免得五、六卷如何分时期引起争论，同时，其他文章一时也审定不了。”我听了中央的第二个决定，觉得和张春桥的意见不符，而且我估计一定是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我心想：五卷怎么可能“尽快”出版呢？特别听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提法，我更进一步发展到恶毒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坐上汽车到招待所的路上，我对王少庸说：“发这两个决定的做法很坏，他们捞了稻草，看来是个阴谋！”当时，我的反革命思想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对我们敬爱的华国锋同志这样肆意恶毒攻击，完全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该万死。到了招待所，大家都休息了，前后处理过三次电话：先是朱永嘉来电，要找我谈，不同意九日上海两报发中央两个决定，被秘书挡了回去。其次是张敬标来电，说朱永嘉在他那儿谈了很久，他很同情朱永嘉，还是要来找我，秘书用我已经休息了为理由又把他挡回了。第三个电

话是凌晨两点半左右，廖祖康从民兵指挥部来电话说有要事，秘书把我叫起来听了电话，电话中廖祖康说：秀珍、国柱同志他们的意见要加强电台和市委机关的保卫，建议请某师长通知电台的警卫连，由电台负责人指挥；康平路机关的警卫连由市委办公室指挥。我记下了字条给了部队的某师长（和我们同住在一号点）去部署，这实际上是下了调动军队的“手令”。同时，秘书告诉我朱永嘉准备不让上海两报发中央的两个决定。我当时的反动思想是和朱永嘉一致的，但我觉得中央这两个决定本身是广大群众拥护的，报纸不发的话会失去群众。因此我觉得还是要发，所以立刻给写作组某某打了电话，告诉他报纸要登两个决定，要朱永嘉稳住。

这时，二号点的活动在民兵指挥部进行。

九日早晨，冯国柱先到一号点，接着张敬标来了，王秀珍在安排张春桥、王洪文的家属后也来到了。我和他们商量，今天如何对两项决定表态。我们就一起返回康平路学习室，读了中央两项决定的清样。我继续从极端反动的思想出发，细看了第一项决定，觉得找不到岔子；细看了第二项决定，我觉得一没有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没有批邓，三没有写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没有写“按既定方针办”我说我们的表态电报要把这四条加上，这实际上是要和中央的决定对着干。冯国柱建议，我们可以表态拥护两个决定，但不要提“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我同意了。我们还议论到：这第二项决定里中央办公厅很突出，我数了一下共有三处。我当时的反动思想仍是攻击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的。张敬标就根据这些意见打电话给办公室起草文件的同志，要他们照办。我们又商量还要继续给马天水打电话，问如何表态。

十时左右，昨晚分散的人又集中起来。这时，从电话里得知文化部、卫生部那里已经收到中央15号文件，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我急着给马天水打电话。当时，马天水已经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第二次接见回来，但他仍不肯接电话。我对马天水的秘书说中央发了两项决定，听说还有一个15号文件，如何表态。他放下电话去请示后答复八个字：“热烈表态，坚决拥护”。我接完电话，在场的常委同志一致不满意，说这么重大的事，马天水为什么不接电话。于是常委决定，一定要马本人接电话。因此又推王秀珍去打电话，磨了好久，马天水终于来接电话了，他还是要我们热烈表态，坚决拥护。王秀珍问他见到三位领导（指王、张、姚）没有？身体好不好？这时马天水撒了一个谎，他说：“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和我个别谈了。”这样一来，大家就如释重负，说是一场虚惊。于是赶快准备起草两个电报，一个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一个是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当天下午，我们收到了15号文件，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和组、办扩大会议，会上我还

说：“马老和周司令到北京开会，刚才通上了电话，见到了上海在中央工作的三位领导，他们身体都还好，工作很忙。马老要我们对中央的两项决定和15号文件热烈表态，坚决拥护。”

从表面上看，我们确实写了两个比较热烈的电报，而在我的心目中，根本不是真正的拥护华国锋主席。而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四人帮”拥护的，这样我才拥护。说穿了，我拥护的是“四人帮”，不是华主席。在我看来，“四人帮”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就是“四人帮”。这就是我的反动立场，说明我早就死心塌地跟定“四人帮”了。

发了电报以后，吃过晚饭，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消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决定，马上恢复正常，不然要引起误会。王秀珍当即向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了电话，告诉他：“撤消五位数（即三万一千人，实际上只有一万一千人），保持四位数（二千五百人），恢复正常。”王秀珍再次问施尚英：“你懂了吗？”施回答：“懂了”。

接着，我和王秀珍在学习室和廖祖康谈话，要他即撤消廖祖康设在另一个招待所的那个据点，他表面答应了，在座的有冯国柱、张敬标等同志。（后来据了解，他们那个点根本没有撤消，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和指挥，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施尚英、某某某等弄在一起，等于另立一个市委，一直搞到十三号我们回来以后。）

九日晚上马天水通知我和王秀珍去北京，并说由空军派专机来接。

十日凌晨，我获悉新华总社赵棣生同志通知新华分社徐寿镗同志，今后不再提“按既定方针办”，我即请秘书告文汇、解放两报负责人，上海报纸宣传要以人民日报、新华总社为准。并告诉了写作组，但忘了通知人民电台。

十日上午，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我和王秀珍、冯国柱、张敬标在我办公室里又错误地分析了形势，认为社论所说：“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可能是有人反对华国锋同志，而“四人帮”是站在华国锋同志一边的，结果胜利了。但我们仍怀疑中央出过事，还怀疑中央办公厅的主要领导同志。十日中午，文化部某某某等来电询问时，我还把这个完全错误的形势分析和反动的怀疑，告诉了他们。下午，专机抵上海后听说江苏、山东的负责同志都回来了，而我们还要前去；心中就认为上海在中央的三个人，肯定有人出事了，并认为可能是王洪文，中央要徐景贤、王秀珍去，是为了回来做新干部的工作。后来，专机到了郑州停靠后，要将机上人员一一报名单后才准予起飞，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又使我们疑心生暗鬼，准备到了北京以后豁出去回不来了。

走以前，我们还和常委约过暗号，但晚上到了北京，听了马天水、周司令讲

了中央会议的精神，听到有毛主席关于解决“四人帮”的多次指示，我们的思想虽一时还不通，但我们商量后觉得应该立即电告上海稳住。打电话的内容经过书面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我当晚即打了电话，告知冯国柱：“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以后，十一日，十二日每晚都由王秀珍、马天水打一次电话，告知上述精神；十一日还通知上海的宣传口径要按照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以上精神，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他们是基本执行的，他们做到了“一切等我们回来再定”这一条。但是，黄涛、廖祖康的一个点和朱永嘉、肖木的一个点，后来继续搞了大量的活动，一直发展到十二日晚上的进一步大闹，布置反革命武装暴乱和十三号的反革命吹风。这是我们在八日阴谋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活动的一种恶性继续和发展，我虽不在上海，但仍要负主要的罪责。

这次在上海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我是直接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我之所以能干出这样的事，决非偶然。这是“四人帮”长期以来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

“四人帮”妄图把上海民兵作为他们搞阴谋、搞野心的工具，蓄谋已久。上海民兵指挥部过去一直叫“文攻武卫指挥部”，“文攻武卫”的名称就是江青提出来的。后来，张春桥看到全国都叫民兵指挥部，上海仍叫“文攻武卫”，感到太露骨，便下令把它改掉。但他们仍然要把上海民兵指挥部作为市委、市革会的一个直属武装部门，不让警备区插手。

一九七三年七月，突然以中央的名义把一九六七年张春桥写给毛主席的一份关于在斗争中重建上海民兵的报告，影印后发给全国各省市，上面写有毛主席批给几个人阅的批示，但我记得毛主席并没有写“同意”等批示。当时，市委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学习讨论，并传达到区、县、局的干部，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觉得上海这样搞民兵武装山头是完全符合主席路线的，是合法的。我现在怀疑，这是张春桥、王洪文他们搞的一个阴谋。因为这个文件只讲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重建上海民兵，根本没有讲民兵脱离军队的具体领导之类的内容。“四人帮”想以这个报告为掩护，在上海拉出一个武装山头，和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相对抗，这是他们策划经营已久的要害问题。这个影印件是发至全国各省市存档的，请华主席、党中央重新予以审查。

去年七、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期间，在锦江小礼堂开了一次黑会，王洪文在会上狂叫：“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还要把这支队伍拉出来！”这更彻底地暴露了“四人帮”的杀气腾腾的个人野心。

今年批邓打招呼会时，二月二十二日晚，王洪文到京西，对我们说：“邓小平想敲掉上海民兵的经验，他要某某省抓出材料来，否定上海民兵的经验。上海民

兵是毛主席支持、关怀的，春桥和我两个人搞的嘛！”毛主席确实最支持、关怀上海民兵，但王洪文讲话的重点是在后一句：上海民兵是“春桥和我两人搞的嘛！”这充分证明张、王妄图把上海民兵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由来已久。我为他们拉武装山头大造舆论。我跟着王洪文去打过靶，我还建议过一个单位的民兵学开飞机。我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干得非常卖力。

总之，“四人帮”长期以来，违背毛主席的“党指挥枪”的教导，分裂党，分裂军队，擅自大立上海民兵的武装山头。几年来，还擅自发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轻重武器。同时，张春桥经常对我们讲：“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这是在灌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反革命思想。王洪文经常叫嚷：“要上山打游击”，“进某某山（上海附近的国防工事）坚守”，“上海没有退路，两边一夹击，只能死守”等等，肖木九月二十八日来传话，暗示林彪、邓小平式的人物要“搞上海”，“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这就等于下了反革命动员令。长期以来，我对“四人帮”唯命是从。在我的眼里，“四人帮”就是党中央，张春桥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是碰不得的。谁反对“四人帮”，我就要死保他们。（注：指死保“四人”）我认为，军队的同志如果反对他们，我要和军队的同志拚；而这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就负隅顽抗，同意调动民兵、军队，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以武力对抗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的罪孽是万分深重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根子在“四人帮”，但我犯下了弥天大罪，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向敬爱的华国锋主席请罪，向党中央请罪，向全国人民和上海人民请罪。我请求中央给我以最严厉的处分。

徐景贤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

3. 王秀珍关于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交代：

交代我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严重罪行

马天水在十月七日上北京后，我们要马天水的秘书到北京后，按惯例和上海通一次电话。马天水的秘书到北京后，找不到“四人帮”中三人的秘书，电话没来。我打了一天电话找，一直打不通，就心神不定。那天下午到川沙县去了。晚上六点三十多分回来后，我就打电话给办公室，问马老有消息没有？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说，没有消息。九点左右，我打电话找公安部的某某某，问他王、张、姚三人情况，他说：王、张、姚前几天还看到，可能因为地震搬家了。没摸到什么情况。九点三十分，我就把正在上海的金祖敏秘书找来，请他打电话找找马老在哪里。他就通过北京的熟人，在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我与他通上了电话，

在电话中我问他：会议开始了吗？他答：还没有消息。又问：来了哪些单位？答：有山东、江苏、湖北和三个军区。还问：那三个军区？答：有武汉、济南、南京军区。我还问了马老好吗？他说：马老有点感冒，现在正在洗澡。晚上十二点，徐景贤同志的秘书告诉我，说老徐给文化部的某某某打了电话，他说华国锋同志已正式通知他，原来他带队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听到这些情况，我心神更不定。

八日上午，我到张春桥的老婆那里，她讲她的儿子原定当天要到北京去，想同张春桥的秘书通电话，从七日晚上到八日上午，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当时就把我们同北京通电话也接不上的情况告诉了她，实际上同她通了“消息”。这也是我的严重罪行。

我打了好多电话，一直找不到“四人帮”中三人的下落，又听张春桥的老婆打电话也找不到张春桥，心里更着急。因此，在八日上午，我就把徐景贤、冯国柱、张敬标同志找来一起商量，又把张春桥的秘书、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肖木叫来，要廖祖康、肖木、某某某再打电话找。张春桥的秘书给姚文元的老婆和秘书打电话，廖祖康给钓鱼台打电话，肖木给王洪文的秘书某某某打电话，都没打通。当时，看到了南京军区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传达了军委首长的指示，又说据警备区告总政通知原在上海开的图书现场会撤销了；他给迟群挂电话没打通；给人民日报某某打电话问宣传方针，他吞吞吐吐神态反常等情况。这时，我们更产生了疑问。

后来，张敬标同志打电话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他说“生胃病了”。徐景贤同志亲自要求马天水接电话，马不接，听徐景贤同志说，马天水的秘书在电话里暗示说：我老胃病复发了。电话就挂掉了。听了这个话后，大家联系前面讲的情况，进行了议论，引起了很大惊慌。就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央出修正主义了，已下手抓人了。

八日中午，我认为自己的分析对了。就带着这种反动的思想情绪，把金祖敏的秘书找来，他原定八日回北京，我对他讲，你到北京后，到京西宾馆马天水的秘书那里去摸摸情况，赶快打电话给我，并且交代了联络的暗号：如一般情况就说肚子痛，情况严重就说胃病，最严重的情况就说心肌梗塞。下午，我和王少庸同志就分头找人部署战备，找了民兵和公安局同志，还有部队两位同志。我给民兵和部队的两位同志念了军委首长指示的电话记录，又给他们讲了马天水到北京后电话通不上，找到马天水的秘书后说“老胃病复发了”等情况，说现在情况反常，可能出事了。然后就说：一级战备撤销后，发现有些单位战备松懈，我们要提高警惕，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空飘、海飘，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等。要他们回去抓紧部署战备。

下午五点，我从反革命的立场出发，同徐景贤一起开了常委会，把列席常委也找来了，但不找空军和海军的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又把找不到王、张、姚的情况，以及马天水秘书在电话中讲的“老胃病复发了”，向他们“打招呼”。傍晚，我给辽宁某某某的秘书打电话，请他给毛远新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毛远新的情况；不久，毛的秘书回电话说：毛远新那里情况一切正常。晚饭后，我从反革命立场出发，觉得要作最坏打算，就找了王日初和车队队长，还有我爱人，要他们给我整理一下放在家里的一些材料。后来，他们整理后，把一部分打印的材料烧掉了，当时我未在场。晚上八点半，金祖敏的秘书来电说“我还好，我娘心肌梗死了”。公安部的某某某又来电告诉某某某，说刚才金祖敏的秘书某某某的电话是在我处打的，现在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时，我的反革命情绪进一步发展。

当时，廖祖康要文化部的某某某打了王、张、姚的三个直线电话，张的电话打通了，但接电话的人说打错了。我还打电话找过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位同志，对方说公出了。这时，新华分社告：今晚十二时可能有重要广播，问电台说不知道，中央台打不通电话。文化部某某某也来电话给徐景贤，说你要我找马老，电话打进去有人接了就挂了。还说，我们这里也都有病情。这时，肖木说：现在已对文化部下手了。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情绪十分紧张、激动，说：接下来要轮到我们的了，怎么办？这时，朱永嘉也来了，他说：我看这次的事是某某同某某的结合搞的，其他人是搞不起来的。廖祖康也说：八三四一部队是很厉害的，没有某主任的指挥，一下子搞掉四个人不容易。接着朱永嘉就提出。我们用民兵打它一个礼拜，不行的话五天、三天，好让全世界都知道，象巴黎公社那样。

于是，徐景贤和我等人决定阴谋策划、紧急部署了反革命武装暴乱。徐景贤同我及其他人研究了分工。廖祖康提出，要警备区的四位同志参加，紧急时，可要他们调动部队。廖祖康、朱永嘉还提出，这次还要工会的同志参加，可以发动群众，号召工人起来。于是，徐景贤就拟定一个分工名单，由他带王少庸和警备区一个副司令、一个师长等人到一个秘密联络点，抓电台、报社等舆论工具；由我同冯国柱、廖祖康、警备区一个副政委、一个副司令和工会的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某某某、某某等人到市民兵指挥部，组织反革命武装力量。到指挥部后，我还把汪湘君找来。张敬标留守康平路，朱永嘉到陕西北路准备舆论工具。徐景贤当场写给我一张我带的人的名单，还写给我一张条子：“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我到了民兵指挥部后，先给民兵指挥部和部队的两个同志，讲了马天水同志到北京开会去了，没有找到王、张、姚，肯定人家已动手了等情况，并大肆放毒，进行反革命鼓动。我煽动说：“马天水去了

没有回来，肯定出问题了，把文化大革命出来的‘中央领导’都抓起来了，我们要同他们干。这几天康平路不能蹲了，否则一网打尽了。”这以后，由冯国柱、廖祖康同部队两位同志和民兵指挥部的部分同志，研究部队的问题。我同总工会和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在另一个房间，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七、八两天所发生的全部“情况”，以及我们几个人的分析。接着我对大家说什么：“上海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我们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让全国知道。”当时，廖祖康也进来煽动说：周司令到上海，可能就到某地指挥抓我们，他们把马天水关在北京。也可能他们到松江某师，叫我们去开会，然后把我們全部抓起来。他要施尚英拿出上海地图，他边看边骂：“上次就告诉你们了，一张象样的地图也没有，这种地图怎么好打仗？”并要施尚英他们马上研究提出具体作战方案（作战方案由施尚英他们具体去搞的，我未看到，只听施尚英讲，是按国庆保卫工作具体方案准备的）。他提出，如果外地军队来怎么办，外地部队可能以加强战备名义来怎么对付，我们要随时掌握动向，采取对付措施。还说，铁路、码头、机场都要控制起来，要保证电讯的畅通，我也同意。后来，就由廖祖康和冯国柱分头去部署落实。然后，我们就密谋策划了如何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力量，决定由原来民兵值班二、三千人，准备增到一万多人，并根据打联司的经验，设立一线、二线（秘密指挥点），在指挥点设置电台。当时，我对陈阿大、黄金海、叶昌明、马振龙等人说，你们打过联司，有经验，那时也分一线、二线的。如打起来，你们都分到各指挥点去一起抓。还对某某某说，打联司时，你指挥调度交通有办法等，给他们打气。当时，有的提出把秘密指挥点设在闵行、吴淞，或者十七棉、三十一棉，大家感到这些地方太远、太暴露，后来决定设在江南造船厂，并设置了电台。施尚英还提出要在杨浦区也设一个秘密指挥点，我同意（后来我得知设在中纺机厂）。这时，黄金海还提出，东海渔业指挥部有电台，也好用。施尚英说民兵自己有电台，够了。马振龙还讲，轻工系统下属工厂仓库里有子弹，打起来可以用等。

半夜，我听到中央两个决定的广播后，我仍坚持反革命立场，还说了很反动的話。我胡说什么：“这两个决定是得人心的，他们抓了旗帜，安定了人心的。”把自己完全放到了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敌对的地位，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九日凌晨，我和廖祖康、冯国柱等人商量，怕老蹲在民兵指挥部遇到情况没有退路，天亮了容易暴露自己，建议撤出民兵指挥部，当时廖祖康就提出撤到某招待所去，我就同意了。早上，我问了徐景贤同志的点和办公室值班室有什么情况，都说没有什么突出情况。于是，我就回到康平路，想把王洪文、张春桥的家属和我们的家属安排转移。我提出，要把大孩子安排到工厂去，小孩子安排到工

人家里去。还说要吧革命后代，好好保存好，等等。后来，徐景贤说，两个决议已经公布，家属现在不要转移。我又去通知王、张两家暂时不动。这天上午，我总算同在北京的马天水同志通上了电话，问他两个决议怎么表态，他说：要热烈表态，坚决拥护。问他张、姚、王三人情况，他说：见到了，身体还好，他们很忙。我们一听到三人情况正常，就松了一口气，心里定了。这说明我们完全站在“四人帮”立场上，把自己命运同他们绑在一起。下午，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修改了给中央的电报。下午七时，徐景贤要我给施尚英打电话说：战备恢复正常，撤销民兵值班的万位数，保留千位数。我还问他“懂了没有”，他说“懂了”。之后，徐景贤和我当面告诉廖祖康，要他把他那里集中的一些人（工会的一些头头）分散，不要再聚在一起了。晚上，接到马天水来电话，通知我和徐二人第二天去北京开会，这又引起我们怀疑。后来又打电话去问马。冯国柱、廖祖康、肖木主张我们不要去，去一个抓一个。后来商量还是去。这时，我给叶昌明打了电话：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少庸、国柱、敬标同志，我们去开会一两天回来。廖祖康提出，只让冯国柱、张敬标送我们上飞机，黄涛不去送。（据回来知道，第二号点根本没有撤销，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继续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

十月十日，我到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但策划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罪魁祸首是我。十日以后，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组织活动的继续发展，十月十三日的反革命“吹风”，都是我在家时煽动、策划的必然结果，罪责完全在我。我对党、对人民犯了大罪，广大民兵和民兵指挥部的同志，还有很多工会和妇联的同志，是没有责任的。我对他们也犯了大罪，我欢迎同志们对我的罪行进行深入揭发、批判。

这次我策划武装暴乱这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绝非偶然，是有它深刻的根源的。长期以来，我对“四人帮”跟得很紧，中毒很深。我头脑中只有“四人帮”，没有党中央，把这几个人看作就是党中央，被“四人帮”的鬼迷住了心窍，以为自己当中央委员、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都是他们的“栽培”，因此把自己的命运、前途紧紧连在他们身上。我一直极端错误地认为，他们是什么“左派”、“正确路线的代表”，认为“跟着他们，就是干革命”。一直到毛主席逝世后，在电视中看到“四人帮”中有的“面容消瘦”，我还专门打电话给廖祖康、某某某，要他转告“四人帮”保重身体。可见，我对“四人帮”迷信、忠心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正因为这样，所以把“四人帮”的垮台，就看作是“右派政变”，就要死保，就去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以武力对抗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说明，路线错了，立场错了，就会把事情全部都颠倒过来了。这次反革命事件的发生，是我紧跟“四人帮”，积极参与他们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罪恶活动的一个大恶果，一次总暴露。早在今年

初，中央一号文件下来的时候，马天水、徐景贤和我三个人曾经有过议论，讲了“张春桥当代总理，外地通不过，华国锋同志当代总理，各方面通得过，摆得平等诬蔑和攻击华国锋同志的话，我还在总工会几位同志和上棉三十厂党委中扩散过。市委办公室有一份简报，其中有几句赞扬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的话，我叫他们删掉，这是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的攻击，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反主席的，我有罪，罪该万死！在毛主席逝世不久，肖木在九月下旬带来张春桥的口信，说什么“上海还没有真正经过严重考验”，“要看到曲折，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等等，与自己头脑中的反动思想一拍即合。正因为我有这种反动的思想，因此，听到“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就站到了与全党、全国人民为敌的一边。这次到北京参加了打招呼会议，受到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耐心教育和挽救，立场、观点才开始转变，看到了自己策划这场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严重性。我决心彻底交代，彻底认罪。

王秀珍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

4. 王少庸的揭发和交代(节录)

交代我参与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

在这件罪恶的反革命事件上，我实在是晚节不终，贻恨终身。这是我长期陷于罪恶深渊，错误地把“四人帮”看成所谓“左派”的必然结果。下面交待我当时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反动的思想和罪行。

……。（略）

十日下午送走了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后，家里剩下我和冯国柱、张敬标守摊子。晚上徐景贤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很快就会回来，一切等他们回来再说。

十二日，在我的思想上是最紧张的一天。从外办，从公安局收到大量的国外的关于“四人帮”被捉的消息。晚上八点多钟，叶昌明、陈阿大、施尚英、朱永嘉、何秀文、廖祖康、肖木，还有王日初、马振龙、王知常也一齐来了。黄涛是先来的。施尚英先讲，他下午去李彬山家里，李彬山支支吾吾，既不讲“四人帮”被捉，也不讲没有被捉，情况也不讲清。廖祖康拿出一份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记录说：“四人帮”，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都被捉起来（廖祖康随后就烧掉了）。跟着就大吵大闹，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敞开胸挽起袖子，都叫喊要在今晚大干。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马天水、王秀珍打来电话，冯国柱去接，这伙人也一拥而出去听电话。回来告诉我，他们争取明天回来，还讲一定要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稳住，一切等他们四位回来再说。当时，这伙人骂得更凶了。接着，又一个一个溜出去了。留下了冯国柱、张敬标和我三个人，再加一个

黄涛。趁此，正好商量一下，决定稳住，等四位书记回来再说。等了好大一阵子，这伙人又溜回来了。这次是朱永嘉出面，煽动性地说，他对张春桥、姚文元完全了解，他那里保存着多年来的张、姚的批件，并用手比画着说：这些都可以公诸于全世界，要今夜就“起义”，大干。要发表告人民书，口号是还我某某、还我某某、还我某某、还我某某，等。要发动群众，造成上海瘫痪，港口瘫痪，在全世界造成影响。还叫嚣：即使失败，也会象巴黎公社一样，用鲜血教育后代。大叫：今夜是最后的一个时机，你们应当下决心，用市委名义和我们一起干。丧失了时机你们将来回忆这段历史，是要忏悔的等等。立等我们表态。

冯国柱要我说，但我仍然站在反动立场上，说什么，要干当然是大干，但不能随便干，一动就会暴露，要从各方面作好准备，问题是怎样动员和组织群众，用什么政治口号去动员组织群众？要知道武装暴动不是儿戏，我不希望看到广暴的前途，等等。最后我说，北京的四个或者还有其他的人，已被捉起来，现在是可以肯定的。但他们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这时他们又骂去北京开会的三人，我接下去又解释说：但有没有其他情况呢？譬如说他们思想不通，顶着；或中央把王、张、江、姚的材料摊在面前他们无话可说呢。总之，一句话，不能动，一切等他们回来再说。冯国柱最后说了几句，无非也是要干，也得等四位书记回来，今夜不能动等等。虽然这夜没有行动，但这伙人的反革命叫嚣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次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中，我是始终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的。特别是我八日那天的一些问话，都是为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起了出谋献策的作用，后来这一小撮人的实际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后果极为严重。我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特别是从各方面了解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果断行动，竟还颠倒是非，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无论在言论上和行动上，我都犯了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我要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请罪。向全市一千万人民请罪。

王少庸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

5. 冯国柱的揭发和交代(节录)

揭发和交代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严重罪行

这次上海阴谋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早就蓄谋篡党夺权的必然产物。其罪恶目的是妄图利用上海这个“四人帮”苦心经营的顽固堡垒，以武力对抗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死保“四人帮”到最后。这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所作的一次最后的疯狂反扑。

“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早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

军事上，直至外交上利用上海这块基地作了大量准备。

据这次大会揭发，七、八月份，张春桥、王洪文授意马天水批发给民兵大批武器，七至十月京沪之间“四人帮”与马、徐、王来往频繁，张春桥对徐景贤说：最近中央不开会，也没有人事安排，实际上是交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底。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要肖木给市委常委带来了反革命口信，也是要加快篡党夺权的讯号。肖木、廖祖康突然窜来上海，行动诡秘，直接插手，相当程度地左右了这次事件。这一切都说明，这次阴谋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结果，也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被粉碎后的垂死挣扎。

在这次暴乱阴谋中，我是参与策划者之一，作为受党和毛主席多年教育的老干部，我的罪行尤为深重。回想起来，只要发出一枪，就要造成流血事件和混乱局面，并将在国际上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影响，后果不堪设想。瞻前顾后，真是惊心动魄，不寒而栗。下边交代反革命阴谋暴乱的过程，揭发“四人帮”和马、徐、王以及我的罪行。

……。(略)

十日到十三日，我和王少庸、张敬标留守康平路，黄涛在外边进进出出，我是这几天主持者之一。详细过程是：十日上午，我和张敬标到康平路见到了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心情高兴，确认了昨天所谓“左”派胜利了的想法，于是到徐景贤、王秀珍住处一齐进行了分析。据后来肖木说，在我们走后，肖木等也到了徐、王处，分析正好与我们相反，肯定王、张、江、姚出了问题，轻则一人，重则一锅端。

下午，王少庸、张敬标和我送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在机场了解到各省去京开会的都已回来，只有上海没回，我们又都感到纳闷。

晚饭后，张敬标对我说，徐景贤秘书从郑州来电话报告，飞机在郑州着陆后在中洲宾馆休息时点了人数，还报职务。这是过去对专机从来没有过的，又听说空四军调度室问民航专机飞走没有，这些又增加了我们的怀疑。

晚上十时，徐景贤来电话对我说：平安到达，一切等他们回来。这时，我们感到困惑不解，但总算有了回音。

十一日

徐景贤、王秀珍临走时，我们常委规定：对他们二人又去北京不告诉其他人。从事后迹象来说，徐、王实际上背着王少庸、张敬标和我，分别作了布置的。王秀珍向工会和民兵，徐景贤向朱永嘉和新闻单位作了安排。这些人不断进出康平路和来电话询问消息，我们按照徐景贤来电口径予以答复，一切等他们回来。

当天，我们得知警备区几位领导同志去南京军区开会。

这一天，由张敬标多次向马、徐、王处打电话，最后才接上了徐景贤，徐说还是等他们回来，但加了一条宣传按照《人民日报》口径。

这几天，我们发现黄涛不好联系，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秘书总说人不在，要由他转告黄涛，他再给我们打电话来。因此，我们三个常委议论，怀疑他在外面和一帮人设了点。

十二日

这一天知道马、徐、王赴京的人，仍纷纷来电询问情况，我们都回说：没有新情况，一切等他们回来再说。

有关单位送来外电和敌台有关“四人帮”消息，各级党委都有反映送来。上午警备区李宝奇同志从南京开了会先回来了。下午警备区其他同志也回到上海。

晚饭前，张敬标同志对我说：民兵指挥部和工会一帮人打电话说要来康平路。我们同意他们八点半来。我和张敬标估计他们是来摊牌的，所以准备四个常委先碰头统一认识，张敬标要人打电话通知黄涛八点到康平路。这时还听说王日初把戴立清从干校接了回来。

晚上八点多，同时来了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施尚英、王日初、朱永嘉、廖祖康、何秀文、肖木一大帮人，当中还插进来了王知常。黄涛只比他们稍早到一会，常委未及研究。由此，我们估计他们已在外边点上碰过了头。

在学习室，他们先拿出了电影工业公司一个同志打给工交组一个同志的电话记录说：北京电影工业会议本来要讨论王洪文对电影工业的批件，后来不讨论了，要收回。接着，施尚英说了他下午从南京开会回来的李彬山处摸来的情况。这时吵吵嚷嚷，你一句，我一句，又哭（马振龙）又跳（陈阿大），要我们表态马上干。正在这时，恰巧马天水来电话，我问马天水究竟什么时候回来，马天水一会答明天上午，一会答下午。我说：你等于没有回答，我们在这里都十分着急，现在人心浮动，流言很多，局势无法控制，有些同志现在很激动。马天水说：你要他们不要激动，不要浮动嘛。我说：你叫我一个人不要激动，不要浮动可以，其他的人我们稳不住。这时王秀珍接过电话说了一段，意思还是要等他们回来，并且说一定争取明天回来。这时这伙人都围在电话机旁，我就叫叶昌明跟王秀珍通了话。

通过电话后回到学习室，他们还是你一句，我一句，什么“软骨头”，“既得利益者”，“投降派”等等，讲了一通，看看没有结果，他们借口有电话、小便等进进出出。我看他们似乎要想商量商量，我们四个常委也需要统一一下，于是我就说：这样吧，干脆你们一起去商量，我们常委也研究一下。

讨论中，我和王少庸、张敬标一致意见是要稳住，要干也要等四位书记回来。黄涛既不讲干，也不讲不干，踱过来踱过去，只说要准备，要准备。

不一会，这伙人又进来了，这时叶昌明、陈阿大等几个人倒不吵了，朱永嘉变成了主角，王知常、肖木、廖祖康在一旁帮腔。朱永嘉十分激动，先煽动性地讲了一大段反动的話，大意是：我没有想到张、姚、王会有如此下场，王不太了解，张、姚我完全了解，我那里有他们全部批件，可以公布于全世界。我认为要“起义”。他们怕群众，怕上海瘫痪，只要守五天，港口码头瘫痪，在全世界就造成影响，要发表告人民书动员群众。口号是“还我某某、还我某某某、还我某某某、还我某某某”，即使象巴黎公社一样的失败，同样也可以用鲜血教育后一代等等。接着他又面对我们说：八号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就都丧失，要干就下决心今夜干，而且要大干，要以市委名义干，你们四人和我们一起干。朱永嘉又接着说：今夜要不干，到了明天，他们三个人一到，要干也干不起来了，那时我看你们就只有唱两只歌的份了，要就唱只革命歌，我就算钦佩你们，否则就唱投降歌，但是当你们回忆这段历史时，将会感到忏悔。

就这样，他们要我们常委表态，我们三个人大意说了这样的话：

一、张敬标同志表示：我们虽然和你们心连心，但现在不能干，我们四个人不能代表市委，没有代表性，没有号召力，小八腊子。七个书记在北京，要干一定要等他们回来。

二、王少庸同志表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和你们一起干。现在四个人关起来了，三个人情况不明。可能有三种情况：一变成叛徒，二思想不通，三在中央拿出罪证面前没有话讲。现在不能随便乱动，一动就暴露。要干，要大干，要等他们回来。

三、我说：我也同意要干，但今晚不能干，一定要等他们回来，前一句我同意“要干”说明我顽固地站在“四人帮”反动立场上，仍然认定是所谓“修正主义上台”，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后一句我说“今晚不能干，要等他们回来”，只是因为他们三人再三交代等他们回来再定，一切等他们三人回来也就会明白。

我还说：我们大家可以商量作些什么准备，但不能象朱永嘉说的那么绝对，好象目前只有两条：要么今晚就大干，唱大戏；要么明日唱两只歌，革命歌或投降歌。可不可以有第三条，比如明天由我们少数人去机场接他们回来，看看他们的态度和带回来的材料再说。

黄涛还是既不说干，也不说不干，只说要准备、要准备。

这时时间已到凌晨二时多，这伙人见无具体结果，就一轰而走。

十三日

散了以后，张敬标同志说，李彬山晚上打过电话来，要来谈谈下午施尚英找他的情况。于是，我和张敬标立即找李彬山到我家，这时已是凌晨三时，李彬山和我们谈了他在南京看到的影印件和听到的传达，但谈得不很详细，时间约半小

时。当时，我们思想反动，仍认为证据不足。送走李彬山，办公室来电话告知，马、徐、王今日上午九时从北京起飞，要我们回来再定，这时才稍为安点心。黎明后，我在散步时，路过写作组，想去看看夜里那么激动并且临走时再三和我们说“决不搞小动作”的朱永嘉有何活动，是不是和黄涛跟这伙人到另一个点上去。我一进写作组，只看到一位服务员同志在打扫卫生，他告诉我朱永嘉睡在马路对面的宿舍，我请把他找来，一看样子，睡眼惺松，不象有过活动，而且一反昨晚那种歇斯底里，恢复了常态，并且对我说：我劝大家不要干了。我没有与他多说，只告诉他马、徐、王上午回来。至于民兵、工会这一帮人，离开康平路以后，搞一些什么，以及后来下去吹风，我们当时一无所知。

上午十时多，王少庸、张敬标和我到机场去接马、徐、王。

中午，十一时半，他们三人到沪。我们一齐到了某招待所，向他们汇报了这几天的情况。下午马、徐、王召开常委会，传达了打招呼会议的情况。

由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果断地对“四人帮”采取了措施，使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阴谋未能得逞，但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我死保“四人帮”到最后，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这一阴谋活动的全过程，把矛头指向华主席、指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犯了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我愿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严厉批判和处理。

冯国柱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

6. 张敬标的揭发和交代(节录)

交代我参与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 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罪行

……。(略)

徐景贤决定到中央开会时，当晚把我们叫到他身边说：“我到北京后，没法告知实情，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顺序告知几号出事，以便你们了解是哪一位出事的情况。”这种做法充分暴露出我们心怀鬼胎，搞阴谋诡计，是极不光明正大的。徐、王走的那天上午(10号)十一点，冯国柱和我又去找了他们，以便问问他们临行前还有什么交代的，在徐景贤办公室又议论社论《亿万人民的心愿》，对社论中的一段话，如“历史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感觉到中央可能出了一些事，但已顺利解决了，并没有感到“张、王、姚”出问题。十日下午二点半，徐、王离沪，在机场休息室，飞机一到，徐景贤鬼鬼祟祟地说：“请机长来休息一下，好问问他的情况”，又等了一下，据说：“机长有任务，不来休息了”，但实际上警卫处负责人已设法摸了情况，偷偷来告诉我说：“我已问了机长，说山东、江苏去京开会的领导同志都已随机返回原地”。他说：“唯独我们上海还未回来”。此时，

在送他们上飞机时，我又将这一情况告知了王秀珍，心里感到有点“异常”，在回来的路上我又对冯国柱、王少庸说了，大家心里都感到怀疑和纳闷。

十一号晚上八时左右，马天水从北京打来电话，我对他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沪，部队领导同志去南京开会回来了，他们可能很快要传达会议内容，传出来后，我们很难做工作，你们不回来怎么办？”马天水即要我向警备区通电话，要他们暂不传达，我说：“由我去通知不妥当。”马天水在电话中说：“你马上同警备区联系，我和周司令商量后，让他再直接通知他们。”我即同警备区政委李宝奇同志通了电话，说：“周司令要打电话给你，请部队慢点传达”。实际上我阻止了军队传达会议精神，插手军队，是犯罪行为。

十二日，下午接到多次电话问情况，还收到了信件反映了“四人帮”的情况，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等人打来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特别是王日初亲自来沪说：“叶昌明已将在干校学习的戴立清叫回上海……”我觉得有问题，晚饭前，冯国柱、王少庸、我商量后并通知了黄涛，定在晚上八时半召集了朱永嘉、王日初、叶昌明、陈阿大、施尚英、马振龙(未通知马，而他主动打电话硬要晚上来参加会)、肖木、何秀文、廖祖康等人开会，当会议开了一段后，这时王知常自动进来(事先也未通知他)在这次黑会上朱永嘉、陈阿大、马振龙、王知常等人发出了疯狂的反革命叫嚣，王知常、朱永嘉例举了历代上政变情况，大煽反革命之风。马振龙反动透顶，声泪俱下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三位领导被抓，我们要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干，我是提着脑袋干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也是非干不可。”还说什么：“我四岁死了父亲，是党培养了我，我这人从不流泪的，毛主席逝世，我也没有流眼泪，今天我流着眼说这些话，我们只有干，才能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无不痛哭失声，可他并不悲伤，而对“四人帮”的垮台，他却声泪俱下，哭不成声，要大干，非干不行，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而我却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胡说什么：“同志们谈了许多意见，很受教育。”说他们是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同情他们等……。我完全站到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立场上，同情他们的反动叫嚣。会上王知常说：“他们三位去开会的，可能投降了，马天水是老干部、徐景贤是软骨头，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陈阿大接着说：“他们回来要把他们绑架起来。”会上，陈阿大还狂妄地跳起来叫嚷要控制机场、铁路、公路、甚至提出沉船封江。朱永嘉等再次提出派兵进驻电台、报社、广播、刊登反革命宣言书，上街拉横幅“还我王、张、姚”，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在这次黑会上，尽管我反复说情况不明，不能冒然行动，但讲了许多反动话，当陈阿大说：“我们要干了，你们倒底怎么办”时，我说：“什么你们，我们，我们同修正主义对着干是一致的，我们是心连心的”。会上主持会议的冯国柱逐个问了大家的态度，都表示要干，会议室内已是极度紧张，我内心很乱，

感到事关重大，此时我极其反动地说：“现在不好动，一动，周围和外面的部队就要进来，不能冒然行动，我已快六十了，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你们还年轻，干革命还要靠你们青年人，不能作无谓的牺牲。”并举了巴黎公社为例，说什么：“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同意，但起义了，马、恩是热情支持的，而由于准备不足最后失败了，仅留下闻名世界的巴黎墙”，我把伟大的巴黎公社起义同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相提并论，立场极为反动，那次反革命黑会之所以最终没有同意立即动手，并不是说明不想干，而是不敢干，是不敢于与人民军队，与广大革命人民较量。这次会议以后，陈阿大、叶昌明、施尚英、马振龙这批亡命之徒继续开黑会，进行反革命吹风，加紧反革命暴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黑会结束，已是十三日凌晨，我同冯国柱、王少庸商量后叫人拟了一电话答复稿交值班室掌握，大意是凡有电话来问中央出了什么事，就说市委未接到通知，情况不知道，如出现有关王、张、姚的大字报，有人打电话请示，可叫他们去做工作，复盖掉，但不要同群众对立，不要上街游行，有情况要立即报告市委，没有市委布置，不要随便答复问题。怕造成混乱局势不好办。实质是继续死保“四人帮”。

十三日凌晨三点半左右，我和冯国柱从警备区李彬山那里摸到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他告诉我们，王张江姚已隔离审查，知道了这些情况，在送走李彬山后，我和冯国柱还是立场反动地说：“听来没有什么重磅炸弹”。这天上午，九点左右，我向办公室少数几个人“吹风”，说“王、张、姚，还有江青肯定是出事了，现在大势已趋，没有办法了，再要动是无谓牺牲，现在一定要稳住，不能轻举妄动，部队都准备好了，只要一动就镇压。”并对办公室讲“我们去机场接马、徐、王少数几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传开，注意保密，注意动向，要守纪律，要注意，绝对不能传出去。”我又重复强调“如街上出现有关王、张、江、姚的大标语，要做工作，要复盖，不要和群众对立”等等，我当时思想上感到大势已趋，如不稳住，出了问题，自己怕担当不起。

十三日上午，在机场上见到马、徐、王，我很激动，流了泪，当时为什么激动得流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从李彬山处摸得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得知“四人帮”已垮台，我不是站出来和这伙敌人划清界限，却感到自己是他们班子里的，他们倒了，我肯定也完蛋了，也没有好下场，我把自己和他们捆在一起，感到树倒猢狲散。另则十二日整整一夜，神经搞得极度紧张疲劳，觉得马、徐、王一走，任何情况都不说，部队都传达了，叫我们留守在家里怎么办，万一搞起来，局势将会怎样！怎么担当得起，我当时的反革命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伤心、委屈、歇斯底里大发作，主要是想到自己没有好下场。到了宾馆以后，已是上午近十一点钟，马、徐、王未能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马上就和我们商量研究，他

们回来后如何传达和下午开常委会的问题，此时冯国柱向他们汇报了这几天的情况，冯还未讲完，我即打断他说：“你们不要想得太简单，他们对你们都作了分析，讲马天水是老干部，靠不住，要投降的，徐景贤是软骨头，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要准备绑架你们呢，你们不要把问题看得太容易。”当马、徐、王拿出拟好的通知基层党组织有关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的稿子，准备立即下发，而我却竭力阻挠，说什么：“这样一来，没有思想准备，要大乱的，不开会讲清楚，绝不能发通知……。”就这样，我延迟了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告诉广大群众的机会，我是有罪的，对广大人民犯了罪。

在接着研究向下传达会议精神时，我又说：“他们要看你们的重磅炸弹，这些影印件他们是否接受得了。”我极为反动地说：“主席的批示，无上文，无下文，没头没尾的，谁拿到都可以用，凭这个材料能打倒？你们如果不把情况说清楚，他们还是要干的。”这些反革命黑话，反映了我自己的反动的内心世界，我眼里没有广大革命群众，看不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对“四人帮”的愤恨，我只看到一小撮亡命之徒，只听到他们的反革命叫嚣，我说他们思想不通，实际上是我自己不通，是我思想的反映和借口。我和他们站在一条线上，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的罪行极其严重。

在宾馆里，我曾经问徐景贤：“你们去中央开会，思想上是否真正解决了，情况到底怎样？”徐景贤说：“讲解决也可以说解决，思想上也并不是完全通。”徐说：“中央叫我们去开会，华国锋同志态度很好，先念同志也比较好，但某某某态度很坏，说什么上海帮……”徐景贤继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并说：“将来怎么样，还要看，现在很难说”，他对中央耐心帮助挽救极为反感，并把他们去中央开会的思想说得模棱两可，这样也引起了我在思想上的混乱和共鸣。我站在反动立场上，胡说什么：“革命革到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弄成这样的下场。”我流着泪，“伤心”地说：“培养一批青年和干部不容易，不知是否会大换班，我年近六十，反正无所谓了”等反革命黑话。我从李彬山那里知道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并看到了马、徐、王带回来的部分材料，我不是立即考虑自己紧跟“四人帮”干的大量反革命罪行，转变立场，划清界线，而是兔死狐悲，伤心落泪，完全暴露出我自己一贯来，对“四人帮”迷信深，中毒深。完全暴露出我自己陷入“四人帮”反党反革命泥坑里，我站在反动立场上，把自己的命运和“四人帮”捆在一起。尤其是在对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问题，我不仅没有清算自己的罪行，而且还一直认为自己“稳住”了局势，这是极其错误的。

在整个反革命武装暴乱过程中，我直接参与和策划，我是紧跟“四人帮”和马、徐、王的，矛头直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武装暴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搞阴谋，搞分裂，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

果。长期以来，我跟着“四人帮”，跟着马、徐、王，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大量坏事，我极度愤恨“四人帮”，也极度愤恨自己跟着“四人帮”所犯的严重罪行，如果“四人帮”不倒，我还将陷得更深，罪行更大，我决心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转变立场，和“四人帮”划清界线，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批判和挽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决不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殉葬品，不辜负党和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挽救。

张敬标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

7. 李彬山的交代(节录)

我参与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罪行的交代

我同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等人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性质是极端严重的，罪行是非常深重的。我们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要害，是妄图以武力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砸烂“四人帮”的英明措施，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罪恶行为。我参与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是党纪、国法、军纪所不能容允的。我在参与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中的所作所为，虽在前段时间有过一些交代，但由于我把自己置于执行者的地位，总认为自己仅是参与了八日下午和晚上的一些活动，没有认识到后来黄涛等人继续搞的大量活动，以致发展到十二日晚上布置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十三日的反革命吹风，都是我们八日阴谋策划的继续和恶性发展。我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因而对自己的罪责认识很差。在领导和同志的帮助挽救下，我恨我转变迟缓，未能及早地充分认识自己的罪行。现将我参与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交代如下：

第一，十月八日参与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召集的黑会。

十月八日中午，上海市委办公室来电话(不是我接的)要我和张宜爱同志下午二时半去市委，市委领导同志有事找你们谈。我和张宜爱约在二时十五分左右，坐我的车子，二时半左右，到了市委办公室，约在三时左右，王少庸、冯国柱来了，后来王秀珍来了，她一坐下，就讲起来了。王秀珍问：部队有什么情况吗？我说，看不出有什么新的情况，今天上午，我们几位领导同志，还在认真讨论刘耀宗同志在警备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子。徐景贤(后来的)拿了军委首长关于加强战备指示的电话记录稿，念了一遍，接着说，内(里)面有句“要防止内潜外逃”，我对“要防止内潜外逃”这句话，考虑很多，可能发生了什么问题，值得注意，要有所准备。冯国柱接着说，人家接管怎么办？我听成人家不管怎么办，我认为冯国柱是对我说的“部队人数有限，要有民兵协助”不满意，我就说：“人家不管，我们管”。冯国柱重复说：人家来接管怎么办罗！王少庸向张宜爱说：张副司令，警备区有调动多少部队的权限？我记得张宜爱说，警备区只有调动一个连

的权限，一个营以上都要经过上级批准。最后王秀珍说，我们还要找公安局和民兵指挥部的同志来谈，就谈到这里吧！我和张宜爱各乘自己的车子，回到浦东大楼参加警备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了。

八日下午五时许，施尚英、钟定栋来浦东大楼找我，当时，我正在开会，我去见了施，钟一下，施，钟向我讲，情况你都知道，市委领导同志交给了我们任务，要向你汇报一下。我考虑在那里谈不保密，同时，我还要参加会议，我向施，钟讲，在这里谈不方便，你们先研究一下，晚上九点钟到我家里谈，我和施、钟就分别了。

十月八日晚饭后，我在浦东大楼审查警备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会)务组送来的简报稿子，拖到约十点钟才回到宿舍。施、钟早在等候我，施尚英说，市委领导同志指示后，我们研究了一下，动用兵力按九月二十三日市委批准同意(按防震和九·九战备期间减少三分之二)的方案，第一批25000人，每区动用十辆摩托车，第二批11000人左右。指挥点准备放到基层单位去，准备搞两个指挥点，江南造船厂作为一个点，已经确定下来了，东面准备搞个点，是否放到国棉十七厂，还要研究一下。点上设电台。钟定栋讲，我们空着手，万一有什么情况，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原来用的手枪，可不可以给我们用一下。我向他们讲，兵力方案我没意见，通讯保障要多样化，有线电、无线电、摩托车、自行车都可以考虑。手枪你们去拿吧。施尚英还问我，在指挥部的军队干部，那些人比较可靠，我从我的错误思想出发，讲了陈振安、连世玉、荀育柏、叶挺礼(立)比较可靠，并说，他们都是受压的，有的被关过，有的在支左和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谈了这些问题后，钟定栋提出要向王秀珍汇报一下。我说，好吧！施尚英就去向王秀珍打电话了。据施尚英传达讲，王秀珍讲，不要汇报了，你们马上回指挥部去，我们马上到指挥部来。我们听了施尚英传达王秀珍的交代后，就没有谈其他什么事情了。

我和施尚英、钟定栋，接到王秀珍的电话后，施、钟坐他们的车子，我坐我的车子，于十一时左右，到达市指挥部。后来杨新亚来了，杨先到施尚英、吴立义和我的办公室，杨还没有坐下来就问道，市委领导同志叫我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我说：市委领导同志马上要来的，来了你就会知道的。候了一会，王秀珍、冯国柱、汪湘君、廖祖康、王锡林、康宁一来到了。我们迎着进了接待室。我记得在座的有王秀珍、冯国柱、汪湘君、廖祖康、杨新亚、施尚英、印玉泉、钟定栋和我。康宁一、王锡林是进进出出的。王秀珍首先问吴立义怎么没有来，去把他找来。王秀珍说过以后谁去落实的我不清楚。等了一会，王秀珍又问：吴立义在什么地方，我说在浦东大楼开会。王秀珍接着说，那就算了，免得惊动大家。(其实办事组已要我的驾驶员开车去接了)。在吴立义还没有到达之前，王秀珍就谈起来了。王秀珍说，今晚我们分成三个班子，我把她(指汪湘君)也带来了，还

有徐景贤、王少庸、张宜爱，带了一批人在另一个地方，张敬标他们在机关。接着王秀珍说，情况更加严重了，小缪（注：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打电话来说：“心肌梗死了”、“门关起来了”“动不了了”。中央可能发生了右派政变，可能马天水以及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被抓起来了，我们要同他们干，这几天，康平路不能蹲了，否则一网打尽。廖祖康说，可能马天水回不来了，叫周司令回来，利用开会，把大家叫去抓起来。我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同时自己也怕被抓。我的反动思想就更加露骨了，我就说，马天水不回来，我就不去市里开会。廖祖康说，周司令回来，可能坐飞机，也可能坐火车，是不是叫人到机场、车站看看，好了解、报告情况，此事由谁去落实的我不知道。王秀珍说，在指挥部不保险，只有一条出路。廖祖康说，西郊公园附近那个地方怎么样？我说，我到警备区已二十个年头了，从未去过，那里不能去。杨新亚说，电台的警卫工作要加强，不能出问题。我说，要防止有人到电台乱讲一通，如果有人搞反革命舆论，我们就要以革命的舆论，反对反革命舆论。王秀珍说，已要那边准备了。王秀珍说，电话要保证畅通，要把市话局的翁默清找来，谁去落实的我不知道。此时我说，市防空指挥所的通播电话最快，只要各单位有人守机，一开就可向几十个单位讲话，大家没有表态，我也没有去落实。廖祖康说，情况究竟怎样，还要看一看。这时人越来越多，我所看到的有陈阿大、王明龙、马振龙、翁默清、黄金海等人。这些人到了后，王秀珍等人就到另两个房间去了，留着我和冯国柱、杨新亚三个人在接待室。冯国柱说，警卫电台的部队，要刘象贤负责指挥，警卫市委的那个连由警卫处负责指挥。我说，刘象贤是警备师的副主任，又是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指挥电台的警卫部队，当然是可以的。后来冯国柱问了外区部队到上海来，要经过什么手续，我说，我没有管部队，情况不了解。杨新亚讲了外区部队要越过防区，不经军委批准，是不行的之类的话。此时我外出了一下，我在办公室内看到，好象是钟定栋在给指挥部之外的人员，分发市民兵指挥部印制的通讯录。然后，我回到接待室，我对大家谈的情况，想了一下，我觉得即使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可能会先造政治舆论，马上到上海抓人的可能性不大，但对马上到上海抓人也应有所准备。我还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约在九日凌晨二时）施尚英进来说，杨副司令、李副政委，你们去休息！我说，市委领导同志还没有走，我们去休息，不象话吧？施尚英说，没有问题，去吧！去吧！施就领着我俩去四楼休息了。

九日早上六时左右，我和杨新亚起床后，我们下到三楼，开始找不到人，后在钟定栋的办公室，找到了施尚英、钟定栋，他们向我讲（杨新亚在场），我们研究了一下，东面的指挥点，确定放在中纺机厂，今天上午准备开个会，找下面布置一下，然后，我们就到指挥点上去。我同意了。他们还说，市委领导同志讲，

你们今天还是回去开会，市委领导同志留下了两个电话号码（红机213，直线377511）。他们把电话交给我后，我们和施、钟就分别了。

我和杨新亚下楼快要上车的时候，杨新亚向我讲，我们今天怎么办？我说，我总得去开会（警备区党委常委扩大会）。杨新亚说，我到机关、部队了解一些情况好吗？我说，好吧！我和杨新亚就分别了。

我回宿舍吃过早饭后，把手枪放回文件柜内，就到浦东大楼开会去了。我到浦东大楼开会后，吴立义向我讲，他要到指挥点上去，要请假，我同意了。因为王秀珍冯国柱已交代我参加警备区党委常委扩大会，如果有什么情况，可能会告诉我的。因此在白天和晚上我没有过问，也没有同外面联系。

十日早饭后，在几位领导同志坐在浦东大楼七〇三会议室的时候，张宜爱告诉我说，市委已同马天水联系上了，并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去开会。我听了这些话以后，就认为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心情比较平静一些了。后来又听到军区通知李宝奇、章尘、张宜爱、杨新亚和我去开会。我估计是要我们去学习中央文件，我就准备去军区开会了。

在去军区开会临走前（中午）施尚英要陈振安到我宿舍，陈振安向我说，施尚英要你到了军区后，情况好坏，要用暗号打个电话来。我就向陈振安说，我讲张国连代我买的照相机（原来交代写成收音机是错的）有个套子没有拿来，要他帮我拿来，就是情况好。我讲张国连代我买的电视机质量不好，不要了，就是情况不好。我对军区开会，听了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精神的传达，觉得原来的做法和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不能再错下去了。我没有打电话回上海。

十二日上午，在军人俱乐部传达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传达军区首长的指示。在传达的过程中，我向李政委讲，我想找施尚英、吴立义做点工作，求得把民兵稳住。向吴立义做工作，准备把一破一立都讲一下，使他心中有个数。向施尚英做点工作，主要是打点镇静剂，要他不要冒失。在李政委同意后，我就决定上午找吴立义到军人俱乐部谈，下午找施尚英到宿舍谈。我和吴立义在军人俱乐部另一个休息室，将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的精神，概要的作了传达，并把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同华国锋同志谈话时亲笔写的指示，也向吴传达了。然后，我就问吴，你们在指挥点上的情况怎样？吴说，我们主要是学习，没有搞其他什么事情。接着我向吴讲，民兵一定要稳住，你不要蹲在指挥点上，马上回到指挥部来，负责掌握全面情况，下面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告我。吴说，我回指挥部来，怎么说法？我说，你讲心脏不太好，要回指挥部休息一下，吴同意照办。

下午三时左右，施尚英到我宿舍，首先我向施说，我们到军区开会，主要是学习中央文件，也研究了关于加强战备的问题，为使施消除徐景贤、王秀珍等人

八日白天和晚上灌输的毒素，我把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同华国锋谈话时亲笔写的指示，向施作了传达，并说明是影印的。同时为了把民兵稳住，我问施尚英，民兵战备怎么样？施说，我们还在点上，还在等着。我怕施尚英一下子接受不了，我没有讲民兵行动要听警备区指挥。我说，民兵行动一定要听市委的指挥，一定要稳住，可不能轻举妄动。施说，你放心，这点组织纪律性，我还是有的。我向施讲，能这样就好。施尚英问我，你到军区开会，有没有表态？我说怎么不表态。施听了这样的话以后很不高兴地说，想不到变得这样快，八日晚上，你不是说马天水不回来，市里开会你就不去吗？我们过去一同工作，配合的还不错，我对你是很尊重的，我告诉你，上海去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被打倒了，你也没有很(好)下场。我怕把事情弄坏，我忍耐了，没有说什么话。施尚英问我还有什么吗？我说，没有什么了。施就起身走了。我送他到门外，我问施要同你联系，电话怎样打？施写了个电话号码(770225)给我。我们就分别了。

我参与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决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错误地认为王、张、姚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马、徐、王同“四人帮”关系密切，跟着他们干革命不会错，被鬼迷住了心窍，因而，我在思想上、行动上不仅没有用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鞭策自己，相反地同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教导背道而驰。同时在他们的捧场和所谓关心下，使我感到他们有的在中央任了重要职务，有的当了市委书记，还没有忘记我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支左的一分子，我感到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我的思想感情就同他们越靠越近，中毒就越来越深，就觉得应该同他们一起好好工作。结果被他们拉了过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成了无产阶级的败类。最后，发展到伙同徐景贤、王秀珍等人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妄图以武力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砸烂“四人帮”的英明决策，成了“四人帮”和马、徐、王的帮凶，犯了极端严重的罪行，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我以万分仇恨自己的心情，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请罪，向上级请罪，向上海广大民兵请罪。

李彬山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四日

8. 施尚英关于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的交代(节录施尚英的《认罪书》)

参与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76年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我秉承马天水、王秀珍的黑旨意，伙同李彬山等人突击向上海民兵发放了武器弹药。其中56式半自动步枪有五万件，63式全自动步枪有二万三千件共七万三千件，弹药是按武器的战备弹半个基

数随武器下发的。半自动步枪半个基数为一百发，全自动步枪为二百发。

我伙同李彬山等人突击发放的武器弹药，是为“四人帮”及其余党搞反革命武装叛乱作预谋准备的。

76年10月8日下午三时半，在“康办”常委学习室，有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王少庸、我、钟定栋、薛干青、徐成虎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徐景贤、王秀珍向我们讲了与“四人帮”联系不上的所谓“不正常”情况，并得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了”、“右派政变了”、“马天水被软禁起来了”的结论。徐景贤、王秀珍就布置了公安、民兵“立即加强战备”。我在听了他们交底后，思想、立场与他们一致，主动汇报了从9月23日以来“战备”民兵的数字：第一批有2500人和一百辆摩托车；第二批为一万余人。王少庸接着详细的问了民兵是否按120人一个连成建制编、武器弹药下发和仓库在那里及能否领得出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汇报”。徐景贤、王秀珍接着要我们抓紧落实“战备”。我问了这次“战备”向下布置的理由是什么。王秀珍就编造说：“最近发现有些单位‘战备’有些松，‘战备’工作不能松，要提高警惕，注意空投、空飘、防止阶级敌人突然袭击”。我又问这次“战备”由谁负责。王少庸当着大家的面说：“‘马老’不在，由(徐)景贤负责。”又说：“还有(王)秀珍，他们二个书记。”我接着说，反正你们四个人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随便那一个。临走时，王秀珍要我和钟定栋立即找李彬山商量研究，并说李彬山、张宜爱等人在我们前面找的，他们情况已知道。

之后，我伙同李彬山、钟定栋、吴立义、印玉泉、章金根、张福男、费海荣等人先后在10月8日晚于李彬山家和10月9日凌晨于民兵指挥部机关策划制订了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内容有：第一批“战备”兵力为3240人和一百辆摩托车及卡车一百辆，并配正、付驾驶员；第二批为13000人，要求与第一批一样；兵力相对集中，按120个人一个连数字编制，启用“民兵101艇”；要求枪弹配套；做好通讯联络保障，有电话、摩托、自行车、并开设十五瓦电台十五部，抓好重点目标保卫工作；指挥点设在江南船厂和上棉十七厂或三十一厂中取一个；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进驻黑指挥点和区里联络员人选；并由我和钟定栋到江南船厂，吴立义和印玉泉到另一黑指挥点，市指挥部机关由陈振安负责；还定了我们头头之间的联络暗语和把手枪随身带至黑指挥点上；要求各区民兵指挥部领导全部在位值班和在9日18时之前全部落实报市指挥部值班室。

9日凌晨三时半左右，在民兵指挥部机关由我和钟定栋把以上策划的方案(除我们头头之间联络暗语和启用“民兵101艇”外)向王秀珍、冯国柱二人口头作了汇报。王秀珍听后除了对选择上棉十七厂或三十一厂这二个单位不同意外，其余均同意，王秀珍并说，这二个厂目标太大，要我们从杨浦区另找一个工厂作指挥点。王还说，她和冯国柱等人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并说，

他们去后叫王锡林告诉我们那里的电话。我向王秀珍、冯国柱二人汇报后，看到马振龙还在，就要他对“四新”、“环球”二个锁厂生产的八百万发弹药扣下，给我们使用，马一口同意，并表示他去落实。

在王秀珍这个黑指示后，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黑指挥点。10月9日凌晨六时，我把王锡林打电话告诉东湖路七号的电话号码向李彬山、杨新亚二人讲了。

10月9日上午九时，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和五个直属师负责人会议，并由我把以上王秀珍编造的“战备”理由和我们策划的方案（除黑指挥点，我们头头之间的联络暗语外）向下作了布置。

之后，我们就立即撤出民兵指挥部机关，并带了手枪、文件箱等到江南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两个黑指挥点上。因为我们是搞阴谋鬼计的，所以我和钟定栋一到江南船厂黑指挥点后，就给同去的章金根、蔡韧等人宣布了三条纪律：不好回家；不好打电话；不好讲出去，要注意保密。我还要江南厂武保组副组长吴盛荣对武保组工作人员讲“注意保密”。并布置汪兴龙，要他们在“民兵101艇”上放一个排的武器弹药。

10月10日晚七时，我在江南厂黑指挥点上拟了电报稿发至各单位，内容有：要求领导检查值班，对电台工作人员注意保密等。

10月11日晚，我把陈振安、杨清河二人打电话给我讲的警备区李宝奇政委在警备区党委扩大会上宣布部队加强战备的军事情报向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人作了“汇报”。

10月12日下午四时，于李彬山家，我为了要逼李彬山给我讲南京开会情况，因此在李给我讲了四月三十日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作的三条重要指示和有人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内容后，我问李，是谁篡改的，李不肯讲，我追问李，是否“三位领导”（指“四人帮”）出事了，李也不作回答，只是反复对我讲，要等马天水、周司令回来。虽然李彬山没有直接给我讲，但我从李的表情上已看出，因此我反革命内心大暴露地对他说，中央“三位领导”（指“四人帮”）出事体，你李彬山逃不了，我施尚英也逃不了。

10月12日晚八时半，于“康办”常委学习室，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我、朱永嘉、王知常、陈阿大、叶昌明、廖祖康、肖木、何秀文、王日初、马振龙等人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在黑会上把下午李彬山给我讲的情况向大家通了，在朱永嘉、王知常二人抛出了要在13日凌晨六时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后，廖祖康煽动大家表态同意朱、王二人抛出的方案。在问到我时，我说：“干”我同意；要市委召开区、县、局会议布置；要有一天时间的准备。最后冯国柱代表常委讲了二条方案，即：各路各方面积极准备好“干”，行动要统一，

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再统一搞。我在“康办”期间，出于准备“干”之目的，给钟定栋打了二只电话。第一只电话，要钟检查各单位值班和“战备”人数；第二只电话，要钟搞一个重点目标保卫方案。钟定栋以后搞的方案，虽然我没有看过，但责任全在我身上。

10月13日凌晨一时半，于总工会机关，有陈阿大、叶昌明、沈函、黄金海、戴立清、我、廖祖康等人策划了反革命吹风会。在叶昌明传达了“康办”黑会内容后，黄金海、戴立清二人抛出了要在13日凌晨六时召开区、局工会负责人会议向下“吹风”的反革命方案，廖祖康煽动大家表态同意黄、戴二人抛出的方案。问到我时，我说：“开吹风会我同意。”

10月13日凌晨三时半，在江南船厂黑指挥点上，我向钟定栋、印玉泉、章金根、费海荣吹了反革命黑风。我向他们通了12日下午李彬山给我讲的情况和11日晚上秦学能打来电话讲到钓鱼台有个反党集团，内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几个人并已捕的消息，还传达了“康办”黑会冯国柱代表市委常委讲的二条方案。我并分析地说，这几个人（指“四人帮”）肯定出事了，已经抓起来了，但究竟是为了什么事不清楚，要等马天水他们明天回来就知道了，市委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在会上都讲了要“干”，我们也要作好“干”的准备。我还反动透顶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地方起来‘造反’。”我并反革命煽动地说：“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就不相信她会反毛主席、会反党。”接着我逼大家表态，在大家表了干的态后，我就要钟定栋、印玉泉二人明天到熟悉一点的杨浦、虹口、南市、卢湾区去向下吹反革命黑风，并了解些“战备”情况。我还授意江南厂王祖耀、葛周福二人召开了反革命吹风会。虽然我没有到会，但责任全在我身上。

13日凌晨，我还要熊顺荣给我烧毁了一本日记本和在71年间写给反党分子王洪文的三封黑信底稿及我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等人一起拍的三、四张照片和一张王洪文在70年初参加江南厂大会，我和王洪文等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

10月13日上午十时，于市公安局，薛干青、徐成虎二人给我看了一大堆“敌台监听”记录（均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并对我说，敌台又在造谣了。我对他们说：“看来已不是谣言，而是成为事实了。”还说：“这几个人（指“四人帮”）肯定出事了，你们思想上要作些准备，但究竟为什么事不清楚，等马天水他们今天回来传达后就知道了。”在徐成虎与薛干青讲到现在脚花乱了，（注：意即阵脚乱了）他们公安局王洪文等人批件交关，我就说：“这些材料之类你们可以作些处理。”后来我在薛干青办公室与叶昌明通电话时，看到薛从一本笔记本中夹的一张纸拿了走到厕所，显然，他是在销毁材料的。

我积极参与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是我一意追随紧跟“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必然恶果，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反革命滔天罪行。

二年多来，通过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了华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报告及有关中央文件、文章等，经过群众对我的揭发、批判和组织上严肃认真又热情的帮助和挽救，使自己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帮的反革命本质，同时对自己由于追随、紧跟“四人帮”及其余党所犯下的罪行和对革命事业带来的恶果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认识。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象我这样犯了严重罪行的人，把我从“四人帮”的反革命泥坑中救了出来，我深深感谢华主席、感谢组织上和群众对我的挽救。我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在今后新长征的路途中，跟着华主席，努力做一个不掉队的战士。

施尚英

1978年12月12日

9. 钟定栋关于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的交代(节录钟定栋《认罪书》)

积极参与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恶活动

参与突击发放大量武器、弹药，在1976年5、6月间，我先后三次参加了李彬山、施尚英召开的策划发放武器的黑会，马天水要指挥部把枪、弹立即发下去，我贯彻了这个黑指示，这次共发放了各种枪支、火炮等计有七万余件，弹药数百万发，甚至连王洪文原来准备库存的二万支全自动步枪也全部下发了。我参与了这个罪恶活动。这是四人帮一伙拼命抓枪杆子，建立第二武装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总暴露。

1976年10月8日下午三时左右，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把我和施尚英找到康平路，向我们交底，讲了马天水去中央开会失去了联系，中央可能发生了所谓宫廷政变、右派政变等，要我们抓好所谓民兵战备值班后，由于自己长期来死心塌地紧跟了四人帮一伙搞阴谋活动，完全绑在他们的一个反革命战车上了，当我听了徐、王的动员后，我当场向他们表示了反革命决心，我说：请领导放心好了，我们马上回去抓落实，并向王秀珍讨了能及时找到她的二个直线电话，我的罪恶目的，能及时向她汇报情况。在返回指挥部途中，我对施说：看来情况是很严重的，现在的关键问题，要抓好所谓战备队伍的落实，力量要形成拳头，手里抓住了几支过得硬的队伍，真的有了情况也不怕了等等。

10月8日下午回指挥部后，我和施尚英就找了作战组长章金根、后勤组长张福男，布置他们连夜到基层去检查“战备”值班和枪、弹等是否落实的情况。在当

晚9时，我和施尚英又赶到李彬山家中共同策划叛乱方案，大家确定了要抓好所谓2500人和13000人(生产待命)的战备队伍的落实，要做到人、枪、弹配套，搞好通讯联络等，在那里，我向李彬山出了许多坏主意，提出了要搞一个联络暗号，向十个区派出联络员抓落实，以及向李提出了要手枪等等。在9日凌晨，我与施尚英、吴立义、印玉泉等人在指挥部又把叛乱计划搞得更加具体化了，确定了我俩和施尚英两人到江南船厂作为一线指挥，吴立义、印玉泉到中纺机厂作为二线指挥，以及在二个黑点上安装电台和向各区指挥部派出联络员等问题。

9日凌晨，我根据王秀珍要加强保护康办的黑指示，我向徐汇区指挥部张知致交了底，我对张煽动说：现在中央的路线斗争十分尖锐，今天可能马上要发生大的事情，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考验我们真假共产党员的时候了，我要张马上组织好所谓在九、十两次路线斗争中，能听我们调动有战斗力的单位，要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去保护康平路的黑窝。

9日上午，我和施尚英、吴立义等人先后召开了市指挥部有关组长、联络员以及十个区指挥部和江南、交运、建工等五个直属师负责人会议，施尚英传达了王秀珍搞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所谓战备口径，并下达了叛乱任务，对区、师分配了兵力数字的要求，要交运局组织100辆汽车值班待命，区、师负责人全部昼夜值班在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事先共同策划好的，我都是同意这样做的。

会后，我携带了作战地图、手枪、匕首等凶器，以及“四人帮”、马、徐、王对搞第二武装的历年的黑指示、王洪文与市区指挥部头头合摄的照片等罪证，和施尚英等人一起转移到江南船厂黑指挥点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活动。

9日下午，在静安区区委布置批斗新华电影院门口的犯罪分子的会议上，我向各区公安、法院、民兵负责人传达了王秀珍搞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关于要所谓提高警惕、加强战备、要注意空投、海飘、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搞突然袭击等黑指示，我还煽动公安、民兵要进行所谓的团结战斗，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这样做，是煽动他们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恶活动服务的。

10日晚上，我和施尚英一起签发了要十个区指挥部和有关直属师要所谓提高警惕，继续加强所谓“战备”的电报，造成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升级。

12日中午，我窜到了民兵101巡逻艇上检查了电台、武器装备和值班的情况，我还向特兵组副组长费海荣和船上值班民兵作了布置，要他们抓好所谓的“战备”值班等落实。

12日深夜，我接到了施尚英要我马上着手搞一个所谓的保卫方案的电话后，我就挂起了作战地图、炮制了一个死保“四人帮”的“捍一”、“方二”的反革命方案。我布置作战组长章金根、特兵组副组长费海荣等人，分别起草了一个设有三道防线，控制徐家汇、静安寺、曹家渡、北站、南京路、大世界、隧道等七个要点，

控制通往江、浙两省的安亭、葛隆、浏河、金泽等六个重要口子，控制电台、车站、机场、市区十座重要桥梁等计划，还打算布置全市 1124 支民兵小分队镇压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还要海洋渔业公司组织 2~3 对渔轮加强对吴淞口巡逻，对叛乱时的区、县作战指挥班子的名单、弹药补给，密令暗号，以及组织一、二、三梯队兵力等方面都作了周密的考虑，我还用红铅笔在地图和方案上都作了标记和修改，写了要增设路障，还替这个反革命方案取了所谓“捍一”、“方二”的题目等等。我这样做的罪恶目的，煽动民兵妄图对外面来的解放军和警备区的部队进行垂死挣扎，我把攻击矛头指向了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3日凌晨三时，施尚英向我们透露了“四人帮”被抓已成为事实，要我们表态时，我带头表示了反革命决心，说：路线斗争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考验，我听市委的，也听你的，我也是活到了 40~50 岁的人了，也做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在我的煽动和影响下，印玉泉、章金根等人也表了反革命决心。

13日上午，我根据施尚英的布置，我先后到了杨浦、虹口区指挥部分别向邓成福、刘裕根等人吹风说：现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十分复杂，要他们注意这几天可能出现新的情况，要抓好所谓“战备”落实等，由于我的交底，虹口区指挥部当晚就召开了所谓的“战备”动员会，搞了夜间紧急集合的预演，发了冲锋枪，组织了一、二、三梯队的反革命叛乱队伍，还打算接管人武部弹药库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江南厂黑指挥点期间，我伪装肚子不舒服，乘人不备之际销毁了罪证。我把从指挥部和家中转移到黑点中的 6 封黑信底稿和 9 份黑材料底稿，还有王洪文对市指挥部关于“4·12”问题的一份黑指示和王秀珍对我关于王西波问题检讨的黑批示，以及连同我自己的自传、整风反右思想小结等 4 份底稿，被我一起撕碎后，放在抽水马桶里销毁了。

13日晚上，听了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打招呼会议精神后，我仍站在“四人帮”的反革命立场上，继续对抗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如在 13 日晚上会议结束后，王秀珍把我和施尚英留下来，要我们把“战备”值班转入正常，施对她说：要求待市委统一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后再撤，我也同意了施的意见，后来王秀珍也同意了我们这样做的意见，没有立即撤掉反革命叛乱队伍，当晚，我和施回到江南厂黑点后，仍未贯彻中央领导的指示，施对大家说：已向王秀珍汇报了，待市里统一传达后再撤队伍，要大家在 14 日晚上继续在黑指挥点值班待命，我也支持了这种做法，这样江南厂黑指挥点的“战备”值班一直保持到 15 日早上才撤消。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马徐王仍抱着很大的幻想，继续执行了他们的黑指示，如十月中旬，马天水要我们调动 200 名民兵去保护康平路的

黑据点也执行了。我的手枪拖到 18 日早上才上缴，而且还叫施尚英、印玉泉的手枪不要缴，放着防防身。我的罪恶目的，妄图继续作为保护“四人帮”在上海的黑基地效劳的工具，我对抗了党和人民对我的挽救。

十年来，我死心塌地紧跟“四人帮”一伙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极为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党的教育，使我深深的感到万恶的四人帮害了我，华主席挽救了我。过去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坚决不做四人帮的殉葬品，听党的话，认真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与四人帮一伙彻底划清界线，重新做人，要求党和组织对我从宽处理，给我悔改自新的机会，决心在新的征途中，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续革命，用实际行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使出自己最大的力量，来赎自己的罪。

钟定栋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

10. 徐景贤写给王秀珍的调动民兵的手令(这是“手令”的影印件：)

加修战备，
请民兵指挥部二千五百人集中，
三万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
（中）
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
保卫的保卫。

徐景贤、李仁斋、王西波、
李彬山

(注)

影印件原文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

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注：圈掉的四个名字，是上海警备区的原副司令杨新亚、张宜爱，原副政委李彬山，警备师原师长李仁斋。

11. 徐景贤写给王秀珍等去市民兵指挥部的指挥班子人员名单(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李彬山、杨新亚、冯国柱、廖祖康、王秀珍

方框内的名字是总工会的几个人：
叶昌明、沈涵、陈阿大、黄金海、王明龙、马振龙。

“丁”是指第一指挥班子的地址丁香花园。两排数字是电话号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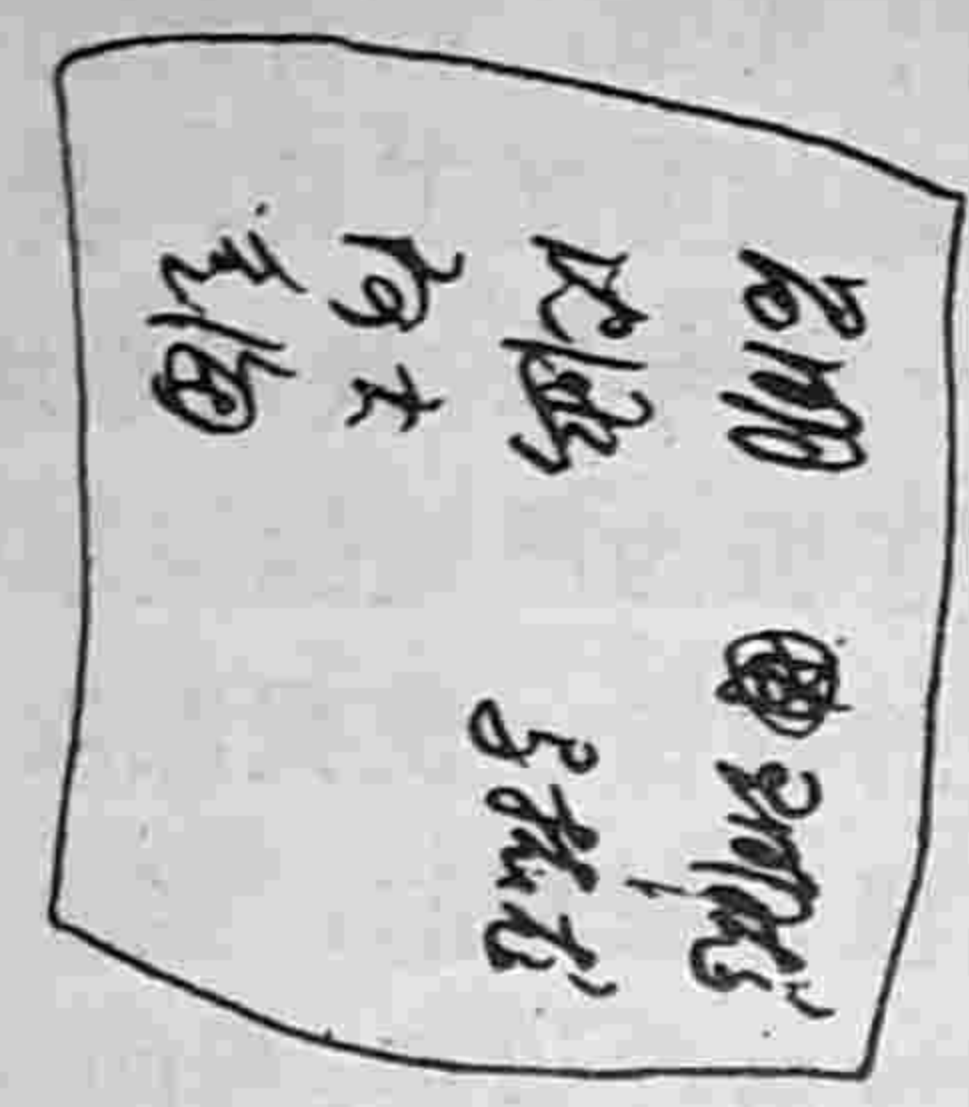
民兵指挥部
徐景贤 李彬山

杨新亚

冯国柱

廖祖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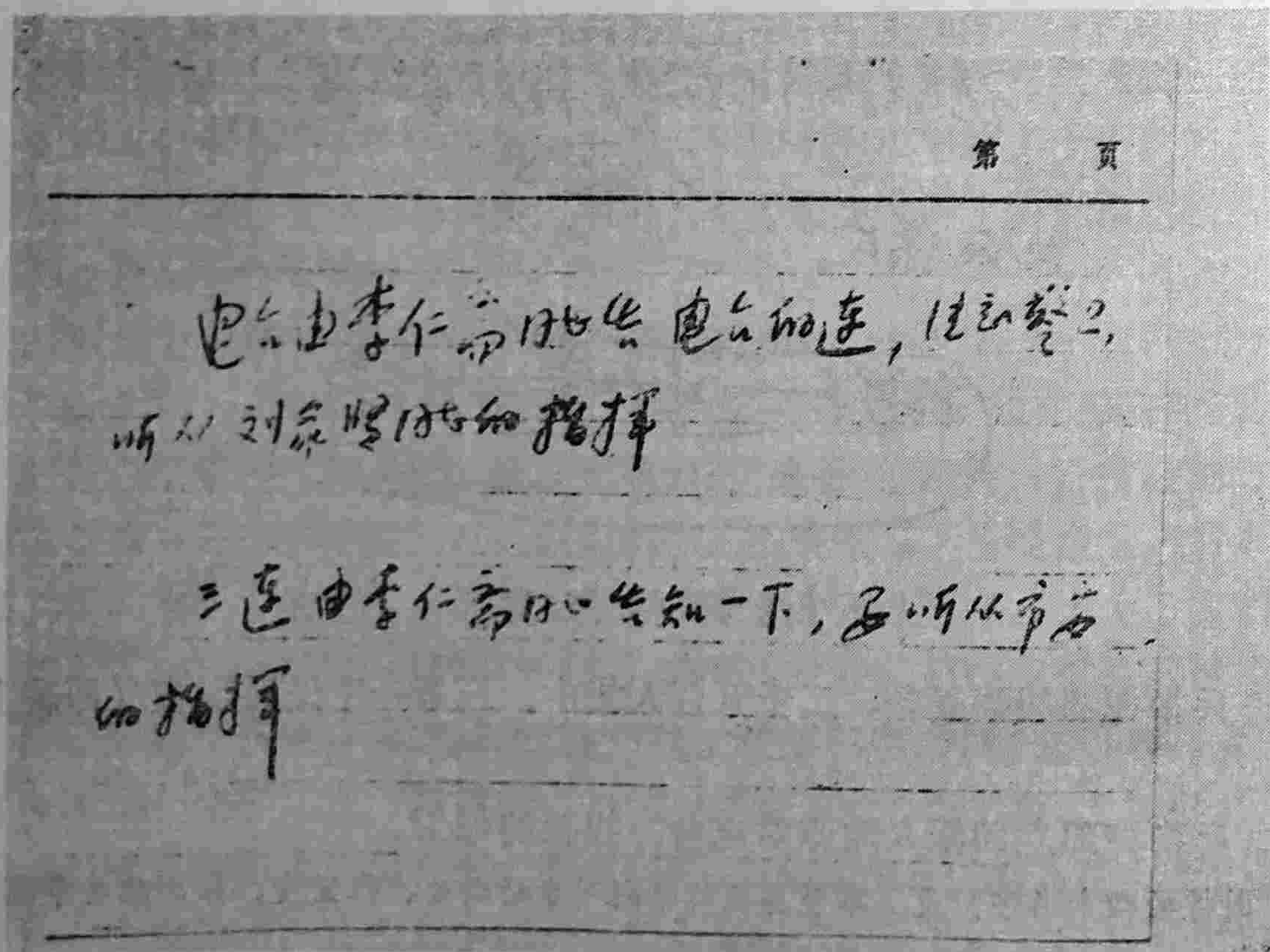
王秀珍



丁
379122
371196

12. 徐景贤写的调动部队的手令(影印件)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凌晨二时左右，徐景贤将这个手令交给了警备师原师长李仁斋执行。李仁斋当即电话通知了两个连队。



影印件原文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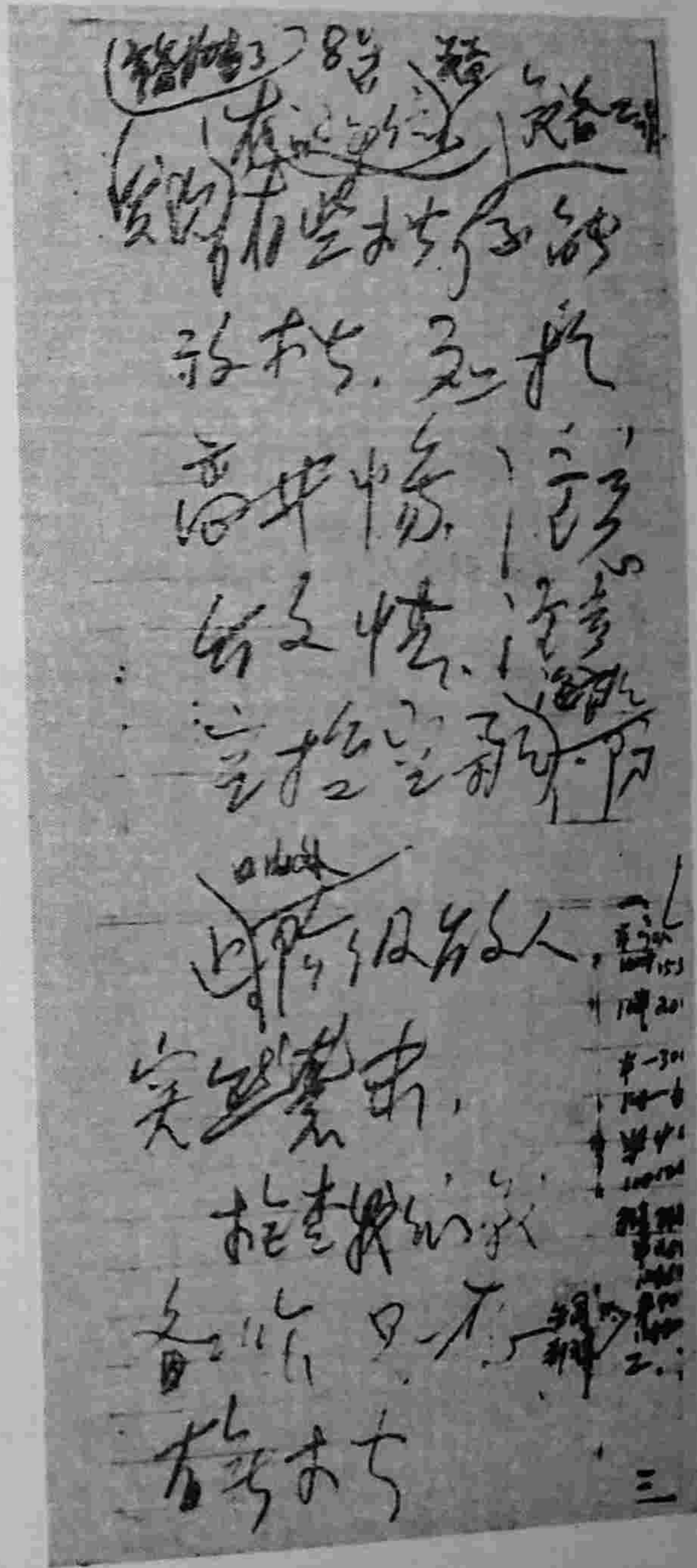
13. 王秀珍口授的“战备”口径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下午，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在市委康平路办公室召集市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钟定栋，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部署反革命武装叛乱。为了掩盖真相，欺骗群众，策划了一个所谓加强“战备”的统一口径。这是王秀珍口述时，薛干青当场的记录：

影印件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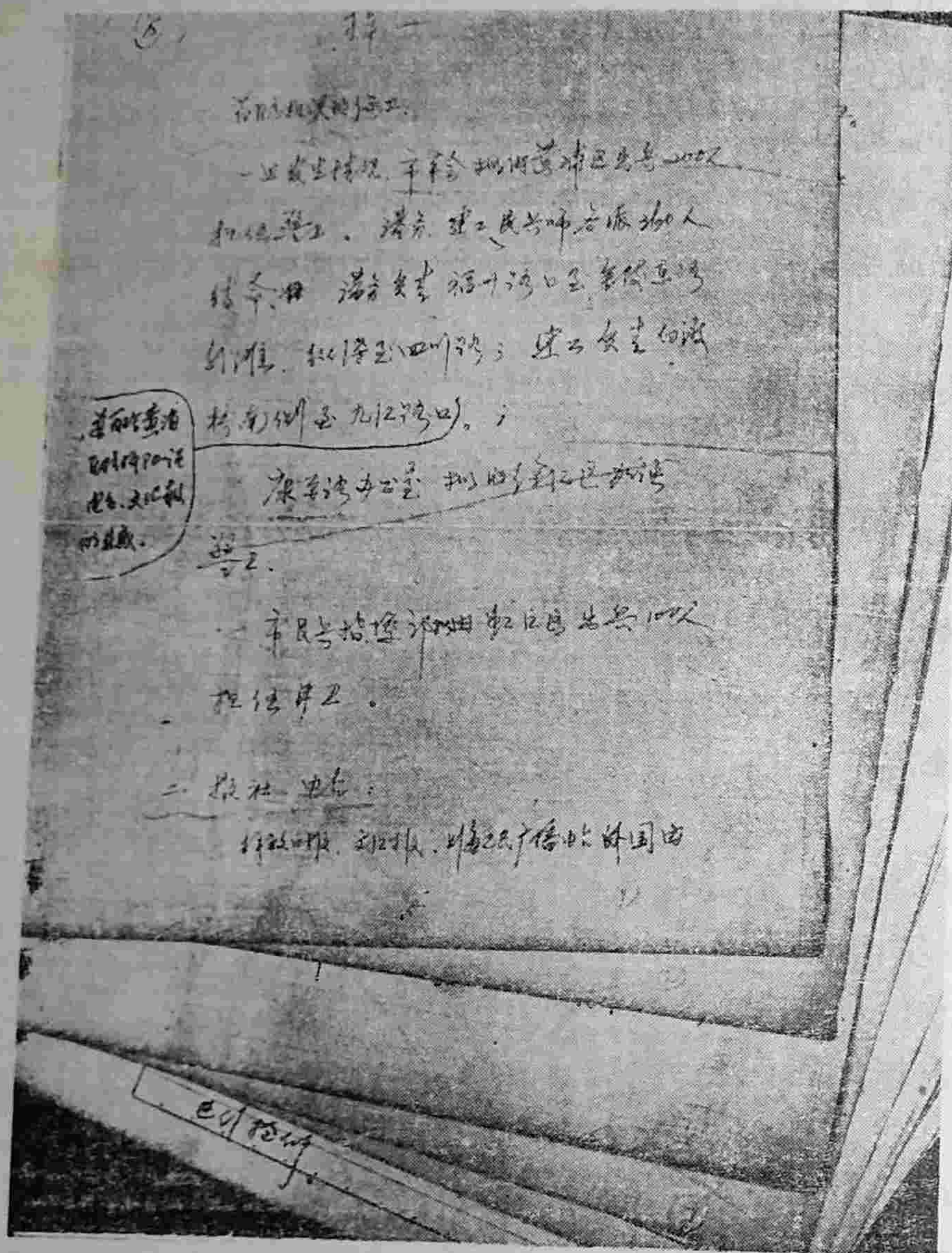
8号

市委检查了发现有的单位战备有些松，战备工作不能放松，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注意空投、空飘、海漂，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突然袭击，检查我们战备工作思想有无松



15. “四人帮”党羽炮制的武装叛乱作战方案

甲、这是武装叛乱方案“捍一”(影印件)



这是武装叛乱作战方案“捍一”的影印件原文：

捍 一

一、首脑机关的保卫：

一旦发生情况，市革会拟由黄浦出兵 200 人担任警卫。港务、建工民兵师各派 360 人待命：港务负责福州路口至金陵东路外滩，纵深至四川路；建工负责白渡桥南侧至九江路口，并配合黄浦区指挥部加强电台、文汇报的警戒。

康平路办公室拟由徐汇区加强警卫。

市民兵指挥部拟由虹口区出兵 100 人担任警卫。

二、报社、电台：

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外围由黄浦(区)各派 100 人警卫，电台的第二机房请长宁区派 100 名加强警卫。内部拟由本单位加强值班。

新华社上海分社拟由静安(区)出兵 20 人加强警卫。

三、桥梁：

贯通南北的十道桥梁：由虹口(区) 200 人，闸北(区) 300 人担任守卫，重点保证白渡桥、河南路桥、西藏路桥、恒丰路桥；长寿路桥、江宁路桥、武宁路桥由普陀(区)负责；吴淞大桥、定海桥由杨浦区负责；白莲河大桥由南市区负责。每桥各组织 30 名民兵加强警戒。

四、车站：

上海站内部保卫工作由铁路分局民兵师负责，外围由闸北区抽调 150 人支援，范围东起河南路、宝山路，西到共和新路，北起虬江路，南到天目路。

五、各区的重点目标，务请各区加强警卫，重点是水、电、煤气和油库。

六、重点支援地域为：

杨浦、闸区、长宁(区)各 500 人分别支援江湾、大场、虹桥机场；徐汇(区) 200 人支援龙华机场。

普陀(区)要密切注意嘉定方向的空降地域。

南市、杨浦(区)部分兵力要密切注意奉贤、川沙、南汇一带的地域。

七、基指(1)(2)：

市指挥所拟由江南厂、中纺机厂加强警卫。

各区指挥所由本区抽调兵力加强内外警卫。

以上各点在特定情况上设置路障。

八、市机动力量：

1. 第一梯队 2280 人，分布在：

杨浦 800，普陀 300，徐汇 280，卢湾 300，闸北 300，上钢三厂 360 和交运

民兵师 100 辆车。

摩托团全部集中待命。

2. 第二梯队为 6000 人，分布在：

杨浦 1500，徐汇 1000，普陀 1000，闸北 500，虹口 500，静安 500，南市 500，卢湾 500。

九、各执勤部队接到命令后，必须做到干部带队，人车配套，枪弹配套。执勤战士佩带《上海民兵》符号，区指挥部负责人佩带袖章。干部要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

十、区指挥核心形成：

杨浦：刘俊杰、邓交福、毛庚娣、毛毓琪、陈荣贵、杨万玉、张长春、王桂宝

徐汇：朱沛池、徐金官、张致和、张金龙、杨双成、杨俊、袁彩凤

虹口：林基能、刘裕根、秦汉龙、王：孙聚云、缪阿娥、肖玉友

闸北：林雷、潘曙明、姚金鸿、姚裕华、秦爱宝、薛约谷

卢湾：吕俊发、杨振权、卢健、杨春寿、董小凤、舒开源、曹林祥、乐松泉、汤东明

南市：陈心明、张秋根、洪德佑、王家权、黄生奎、王金龙、张霞琴、季振邦

普陀：刘志伦、董绍波、黄惠庭、朱有巧、盖启能、张、王玉智、刘德荣

长宁：张学文、王义德、王昌吾、郝树才、陈飞轩、徐荣芳、杨海妹、陈德元

黄浦：杨清河、张学成、牟玲芳、姚剑青、吴渭中、谢图良、蒋召华

静安：陈根生、姚铭一、朱佐娣、李金良、刘、蒋银相

区基本指挥所以区指挥部为主，还可选择一至二个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表现好的、单位领导重视的工厂，作预备指挥所。指挥核心分二至三个小组，并配备适量的工作人员具体实施指挥。预备指挥所隐蔽待命，在特定条件下实施指挥。

十一、要加强对社会面的控制。

各里弄民兵小分队要配合民警、里弄干部掌握四类分子和对现实有危害分子的动态。凡发现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进行各种现行破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给予严厉地打击，如发生反革命骚动，要与挂勾的民兵单位就地稳住群众情况(绪)，掌握动向，打击现行犯罪分子，维护好本地区的革命秩序。各区、县民兵指挥部要加强对在押对象(和劳动学习班对象)的看管。

十二、弹药补给点及武器修理小组情况：

A 第一弹药补给点：与警后装备处联系后，到青浦朱家角 717、青浦赵巷北

千山，松江横山等仓库拉。

第二弹药补给点：(1)造弹工厂，徐汇斜土路四新锁厂，由徐指派兵保护，补给卢湾(区)、上钢三厂、江南(造船厂)、建工、港务等单位；嘉定县外岗环球锁厂补给黄浦、静安、普陀等单位。(2)制造武器单位的试枪弹分别在那个区就补给这个区：杨浦电缆厂、木螺钉厂；徐汇新中华(汽枪厂)；南市、浦东；汽枪厂；闸北：压缩机厂；虹口：金属丝网厂、汽焊机厂。上述各点由所在单位派兵严加保护弹药，以上单位的弹药都是 56 式 7.62 步机弹。

青浦 11 号桥的国光口琴厂制造 37 高炮弹。

造弹厂及制造武器单位的试枪弹，要与市工交组军工组联系好，由工交组军工组下达命令。

B 轻武器修理：民兵武器修理所抽调 13 名，制造武器工厂的各单位抽调四名(有修理能力)同志带上修理工具带上部分零件，分到各区、师指挥点组成修理小组对轻武器修理。

C 对高炮(机)修理：民兵武器修理所抽调 37 高炮炮工四名，57 高炮炮工四名，14.5 高机枪工三名。制造高炮(机)工厂、建筑机械厂 37 高(炮工)五名，第一印刷机械厂、汽轮机厂 57 炮工各抽九名，化工机械厂、大隆机械厂 14.5 高机枪工十一名，长江机械厂、长城机械厂 100 高炮炮工各抽九名，分别到各区、师指挥点组成修理小组，对高炮(机)进行修理。

D 民兵武器修理所其他同志往造各种武器的零件及修理无(现)场无法修理的轻武器。

E 如高击(机)现场无法修理，拉到各制造工厂进行抢修。

十三、标记和口令：

一、标记：

凡执行任务的全体民兵必须佩带《上海民兵》符号，区、县指挥部(直属师团)的指挥人员必须带指挥袖标。

二、口令：

为了保证民兵在执行任务中容易识别敌我，确定口令，定期更换。

×月×日

(1)火炬 = 光明；(2)东海 = 前哨；

×月×日

(1)东风 = 万里；(2)红旗 = 前进；

×月×日

(1)繁荣 = 富强；(2)先锋 = 新华；

×月×日

(1)光辉 = 朝阳; (2)星火 = 灯塔;

×月×日

(1)瑞金 = 红星; (2)海滨 = 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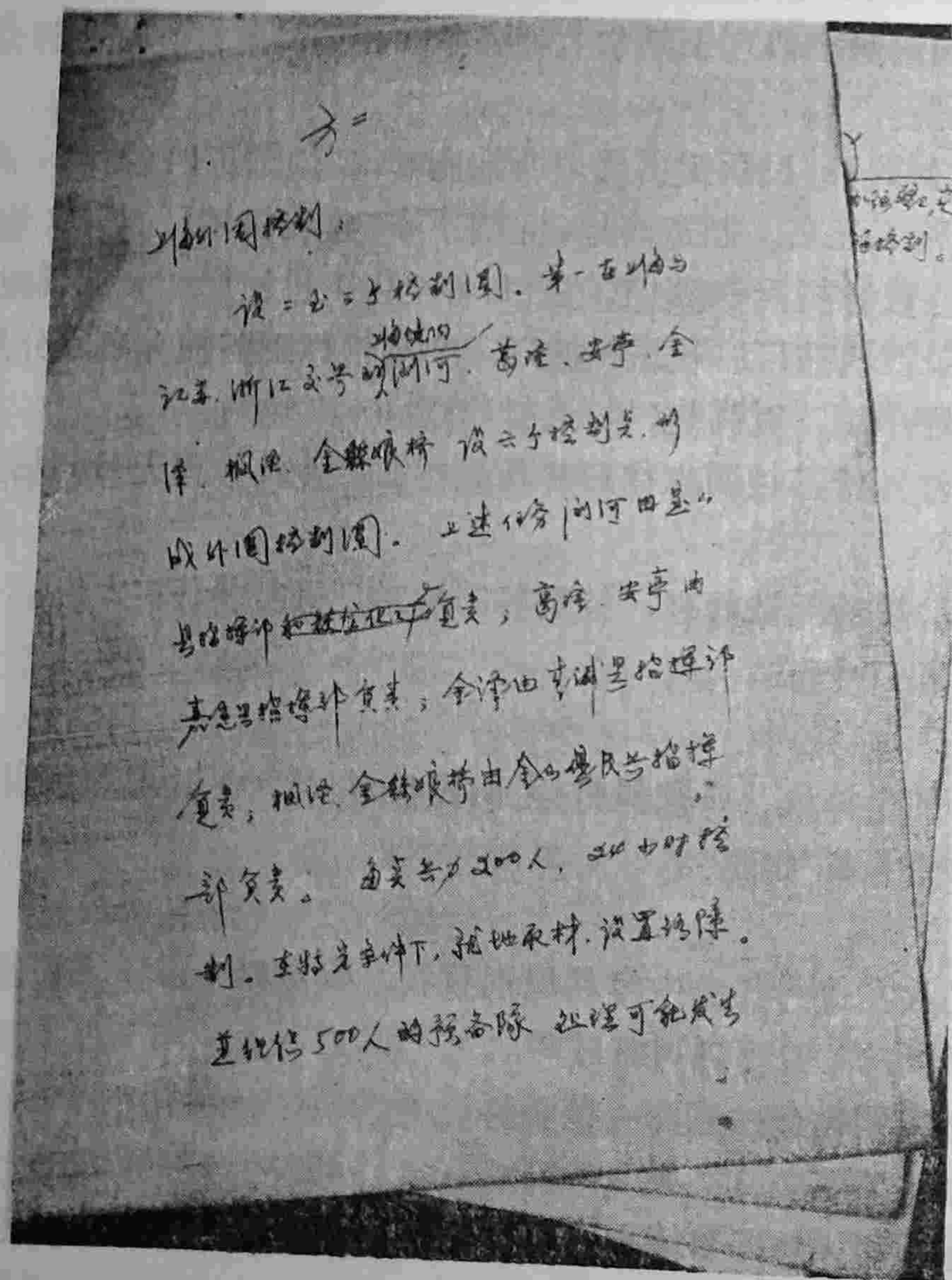
注: 口令(1)从0:00——12:00;

口令(2)从12:00——24:00;

三、暗令:

凡进入指挥机关, 除对口令外, 还必须对查暗令。按市指统一通知, 不定期更换。团结战斗 = 争取胜利

乙、这是武装叛乱方案“方二”的影印件:



这是武装叛乱作战方案“方二”的影印件原文:

方二

上海外围控制:

设二至三个控制圈。第一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的上海境内浏河、葛隆、安亭、金泽、枫泾、金丝娘桥设六个控制点, 形成外围控制圈。上述任务浏河由宝山县指挥部负责; 葛隆、安亭由嘉定县指挥部负责; 枫泾、金丝娘桥由金山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每点兵力200人, 24小时控制。在特定条件下, 就地取材, 设置路障。并组织500人的预备队, 处理可能发生的情况。黄浦江大江由松江县指挥部组织300人警卫, 实施控制。

沿海各县加强哨所执勤, 沿海巡逻, 并组织1000人的预备队, 处置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沿龙吴路(港口开始)、中山南路、中山西路、中山北路、邯郸路、军工路、黄浦江形成第二控制圈。按行政区分段包干, 封锁通往市区的各道路口, 在特定情况下设路障。

黄浦江上各道渡口由交运局民兵师责成内航公司民兵团控制轮渡, 加强警卫。特定情况下, 轮渡停止驶航, 渡船一律在浦西停靠。

黄浦江沿岸, 请杨浦、虹口、黄浦、南市、徐汇加强警戒。隧道与过江污水管道, 请南市、卢湾分别加强警戒。如有情况, 实施封闭, 凭特定通行证通行。

吴淞口请渔业公司民兵团派出2~3对武装渔轮加强巡逻, 发现情况可用电台与市基本指挥所联络。同时按照现有武器装备组织渔轮机动待命。

沿陆家浜路、徐家汇路、肇家浜路、乌鲁木齐路、新闻路、石门路、苏州河十道桥形成第三道控制圈。按行政区分段包干, 封锁路口、桥梁。在特定条件下, 设路障。

通信

一、调摩托车厂一个摩托连(三轮五辆、两轮二十辆)进入市基本指挥所: 调杨浦两轮十五辆, 三轮五辆, 秘密进入预备指挥所。调邮电民兵师四辆通信车分别进入基指预指。

二、各区除加强无线通信外, 组织二个摩托通信班, 一个自行车通信排。

三、郊县的通信, 金山、奉贤、南汇、宝山、川沙、崇明已配置一部电台(八一型), 可开设网路, 实施通信。其余四县要配置电讯器材和通信人员, 担任通信任务。

此外, 各县要组织一个摩托通信班, 由县邮电局民兵组织担任此项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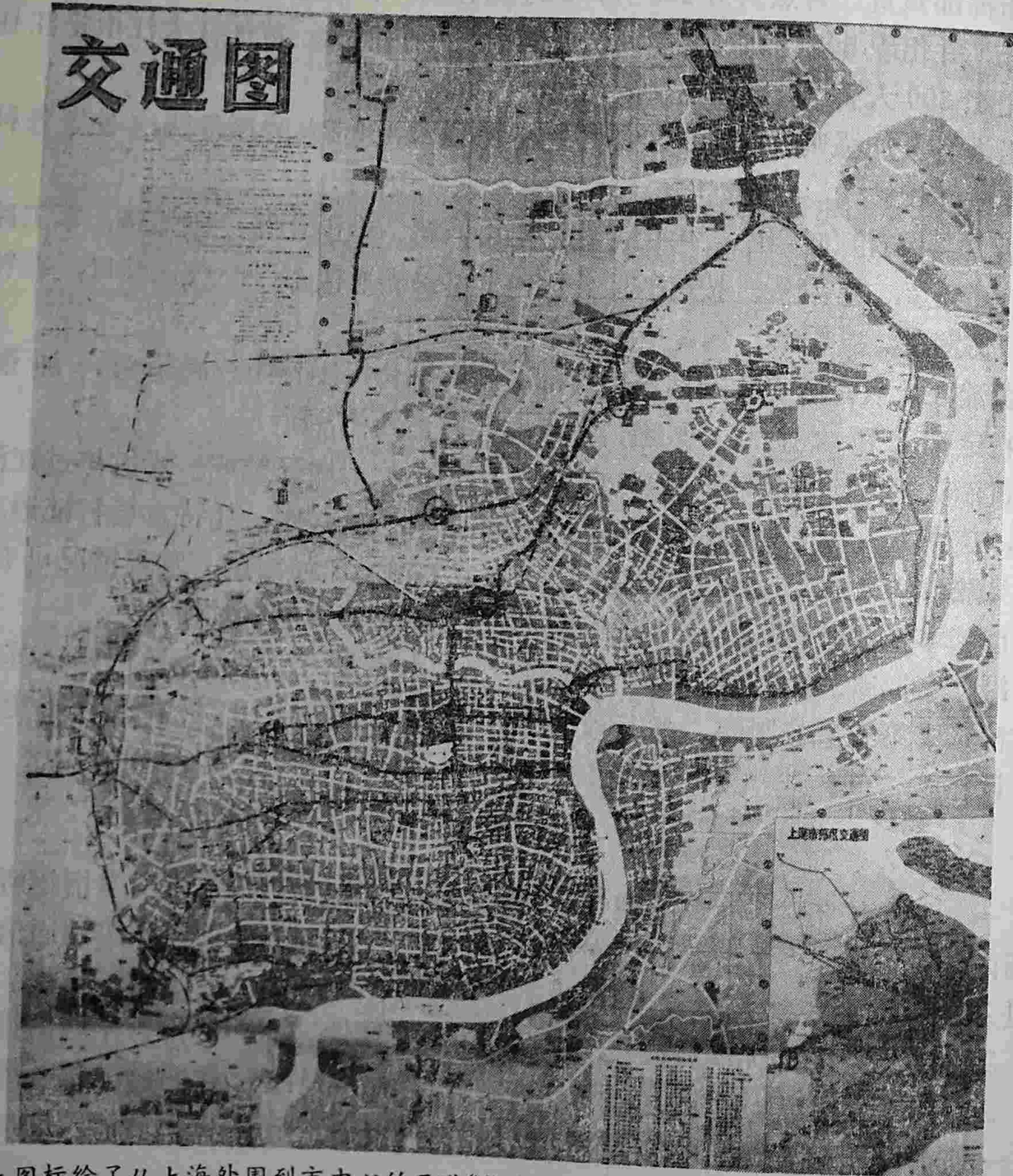
四、重点师、团的通信保障拟在建工、上钢一、五厂、交运局、金山石油化

工总厂配置通信器材和人员。开设电台；港务、铁路分局、邮电局、渔业公司、海运局、长航局要利用原有的通信设备，统一呼号、频率，组成通信网络，进行通信联络。新设电台的通信人员由邮电负责调派。

五、为了保障民兵的通信联络、根据目前装备电台的情况，尚缺四十部电台，如需实施以上方案，拟请工交组调拨。

注：“通信”是附在反革命武装叛乱作战方案中的通信保障计划。

丙、这是武装叛乱方案附图，三道控制圈部署图的照片：



上图标绘了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的三道“控制圈”。有“○”者表示重点控制的交通要道。右下角附图，标绘了第一道控制圈。在上海外围与江苏、浙江交界处设置了六个控制点，企图阻止江、浙部队向上海市区开进。

16. 钟定栋关于炮制武装叛乱作战方案的揭发交代(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一、接市委通知十月八日下午三时，我和施尚英到了康办，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在座，王秀珍说：马老昨天突然接到北京来电话要他去开会，一去就失去了联系；后来找到房祖（佐）庭，他说老胃病发作。中央可能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是发生了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了。你们要抓紧研究战备措施的落实，并统一了向下布置的口径。王秀珍还说：要准备找不着我们，你们要作好独立作战的思想准备等。

二、十月八日晚上九时四十分，我和施尚英在李彬山家密谋策划的几个问题：（1）首先抓紧落实好原定的第一批 2500 人的应急队伍和 13000 人的预备应急队伍。（2）做到干部昼夜值班，车、人、枪弹配套。（3）搞好几套通讯联络问题。（4）规定了联络暗号。（5）初步研究了指挥点。

三、十月八日晚上十一时许，王秀珍等人到市民兵指挥部对李彬山、杨新亚、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印玉泉等人说：现在情况更加严重了，金祖敏的秘书小苗（缪）从北京打电话来说他娘心肌梗塞了。根据王秀珍等人的黑指示，我和施尚英、吴立义、印玉泉和作战、后勤组有关人在十月九日凌晨一时许，又进一步策划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方案，把在

一、接市委通知十月八日下午三时，我和施尚英到了康办，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在座，王秀珍说：马老昨天突然接到北京来电话要他去开会，一去就失去了联系；后来找到房祖（佐）庭，他说老胃病发作。中央可能发生了什么问题，可能是发生了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了。你们要抓紧研究战备措施的落实，并统一了向下布置的口径。王秀珍还说：要准备找不着我们，你们要作好独立作战的思想准备等。

二、十月八日晚上九时四十分，我和施尚英在李彬山家密谋策划的几个问题：（1）首先抓紧落实好原定的第一批 2500 人的应急队伍和 13000 人的预备应急队伍。（2）做到干部昼夜值班，车、人、枪弹配套。（3）搞好几套通讯联络问题。（4）规定了联络暗号。（5）初步研究了指挥点。

三、十月八日晚上十一时许，王秀珍等人到市民兵指挥部对李彬山、杨新亚、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印玉泉等人说：现在情况更加严重了，金祖敏的秘书小苗（缪）从北京打电话来说他娘心肌梗塞了。根据王秀珍等人的黑指示，我和施尚英、吴立义、印玉泉和作战、后勤组有关人在十月九日凌晨一时许，又进一步策划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方案，把在

钟定栋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

李彬山家中商量的措施更加具体化了。研究后的情况由施尚英向王秀珍作了汇报，王表示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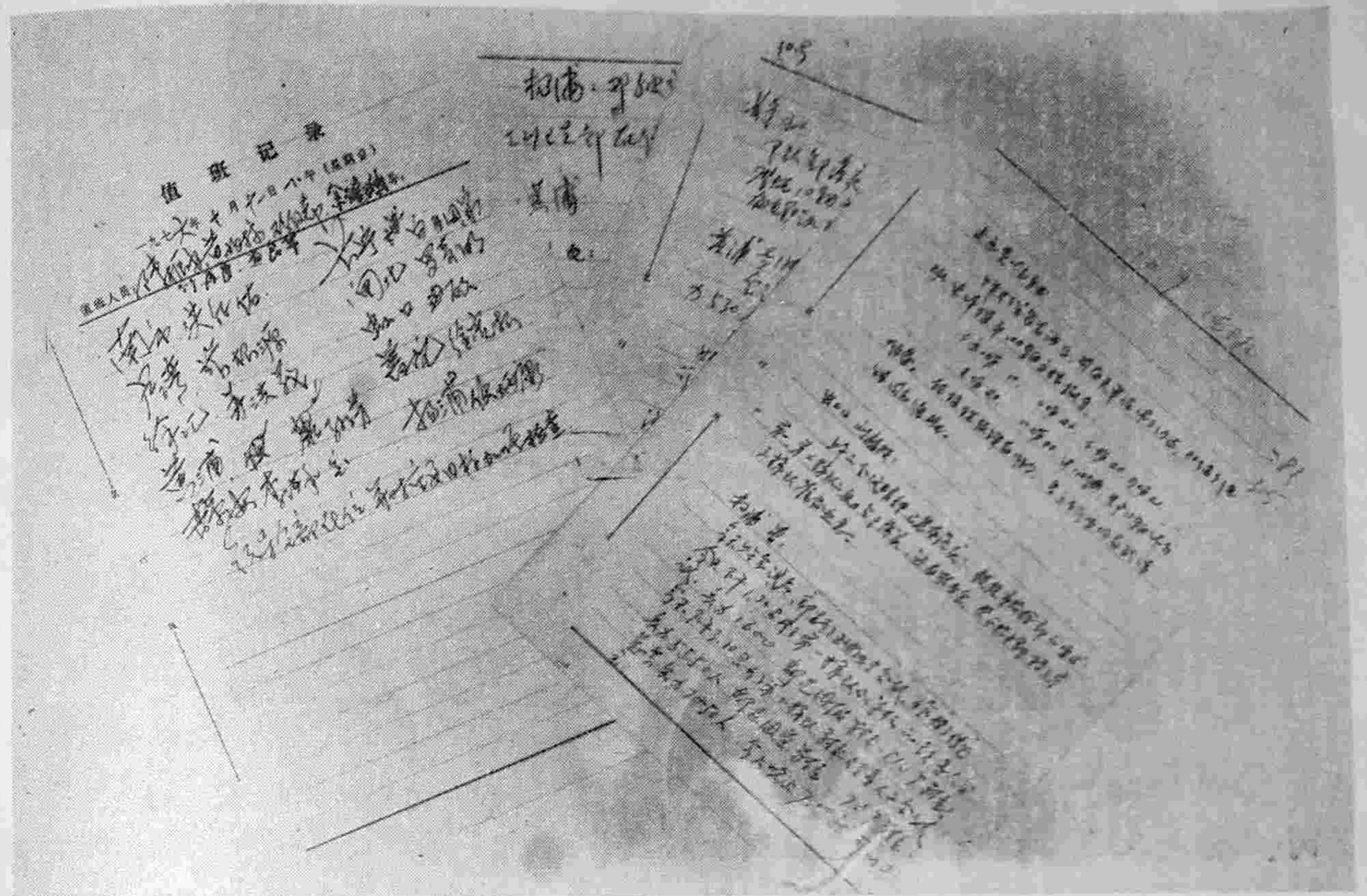
四、十月十二日晚上反革命武装暴乱达到了高潮，我亲自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暴乱方案。晚上12点钟左右，我接到施尚英电话，要我立即着手搞一个重点目标的保卫方案，我当时认为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了，我找在点上的人员挂起了地图，制定了一个完全为保护王、张、姚在上海这个黑基地服务的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方案。如外面(南京方面)派解放军来包围上海，警备区派部队来接管、抓人时，我就组织反革命的抵抗。我在起草这个反革命方案过程中，也要尽了反革命二面派的手法，虽然也写了狠狠打击把矛头指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我在这个方案上并亲自加上了反革命的标题(所谓捍一、方二)。

钟定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17. 十个区民兵指挥部、五个民兵师兵力、武器统计表影印件：

区	名称	负责人	地址	电话	人数	武器	其他
杨浦							
徐汇							
普陀							
虹口							
闸北							
宝山							
浦东							
金山							
奉贤							
南汇							
嘉定							
总数							

18. 十月九日、十一日检查各区(师)“领导在位”和兵力落实情况的值班记录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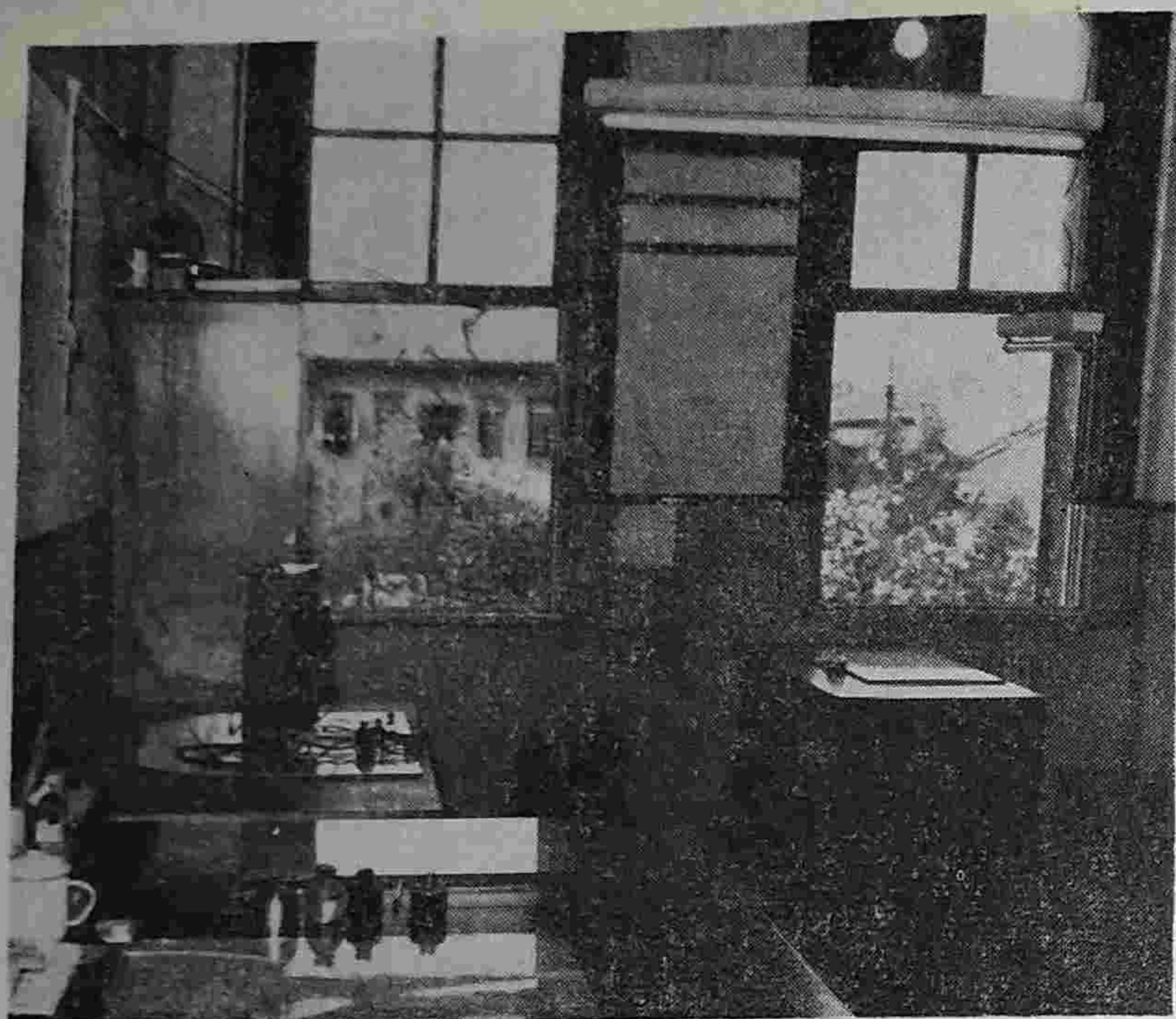
19. 开设秘密指挥所

上海民兵指挥部于十月九日开设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基本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由施尚英、钟定栋负责；预备指挥点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由吴立义、印玉泉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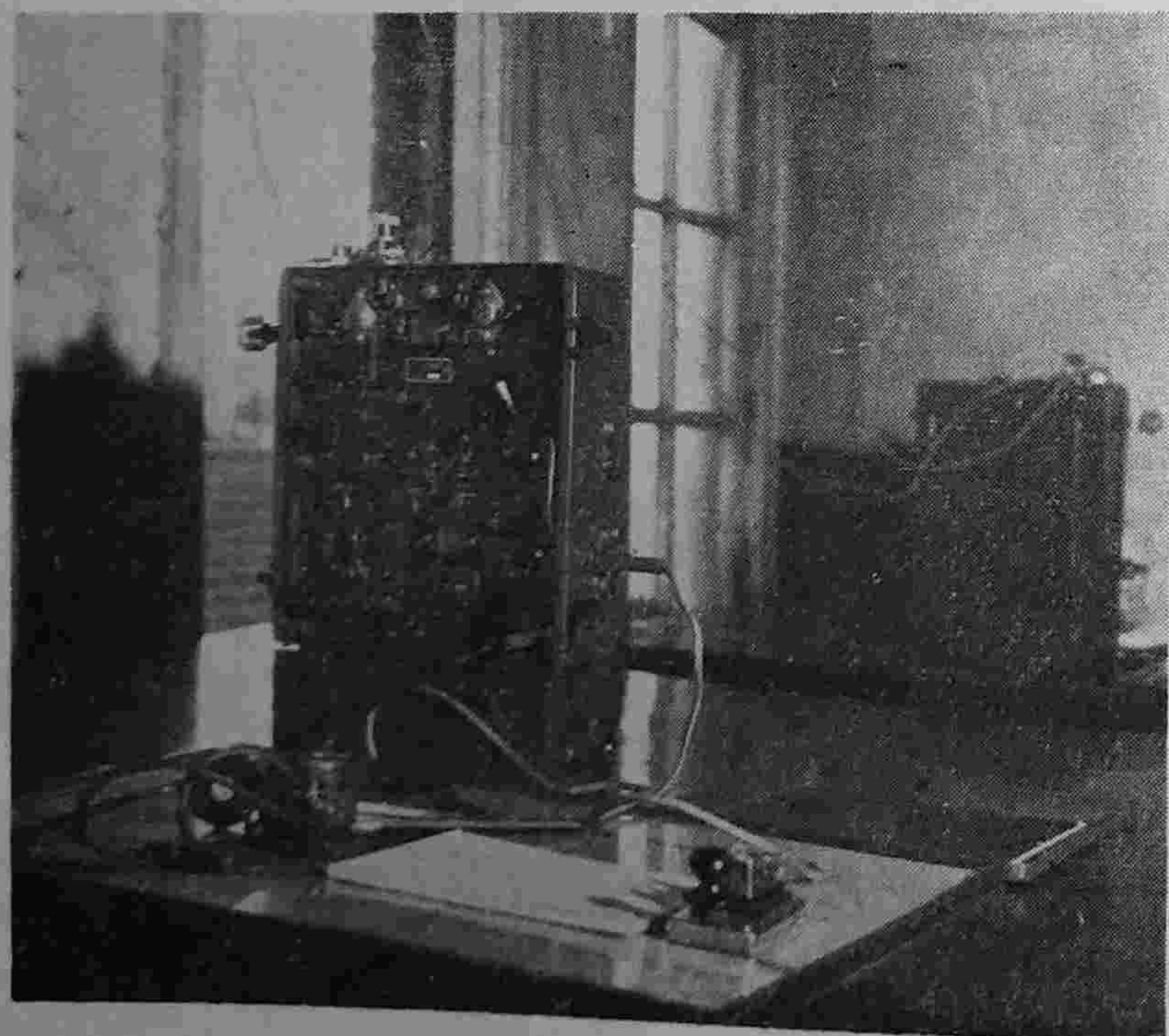
甲、这是基本指挥点的办公室和电台天线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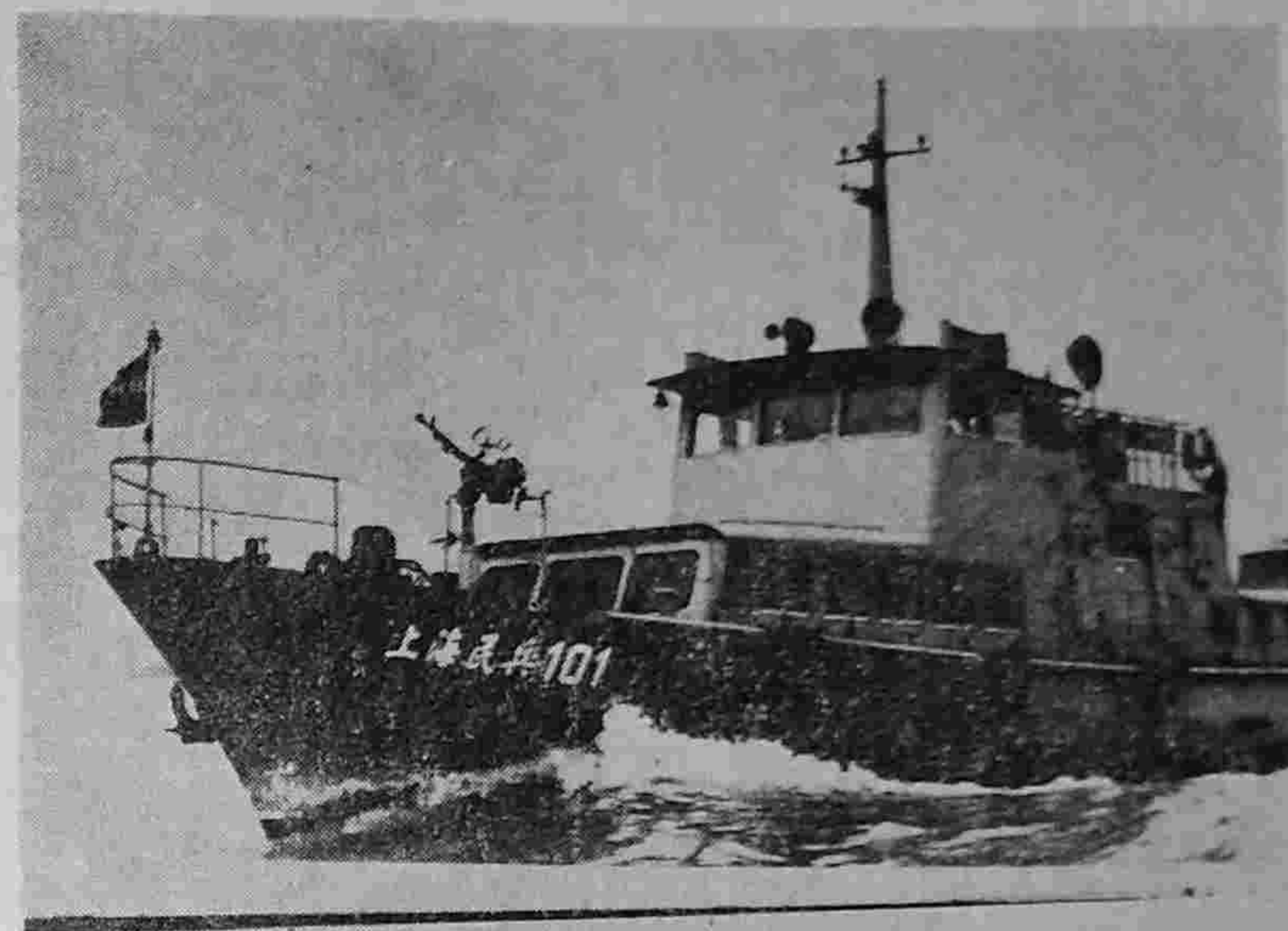
乙、这是在基本指挥点架设的电台的照片：



丙、这是在预备指挥点架设的电台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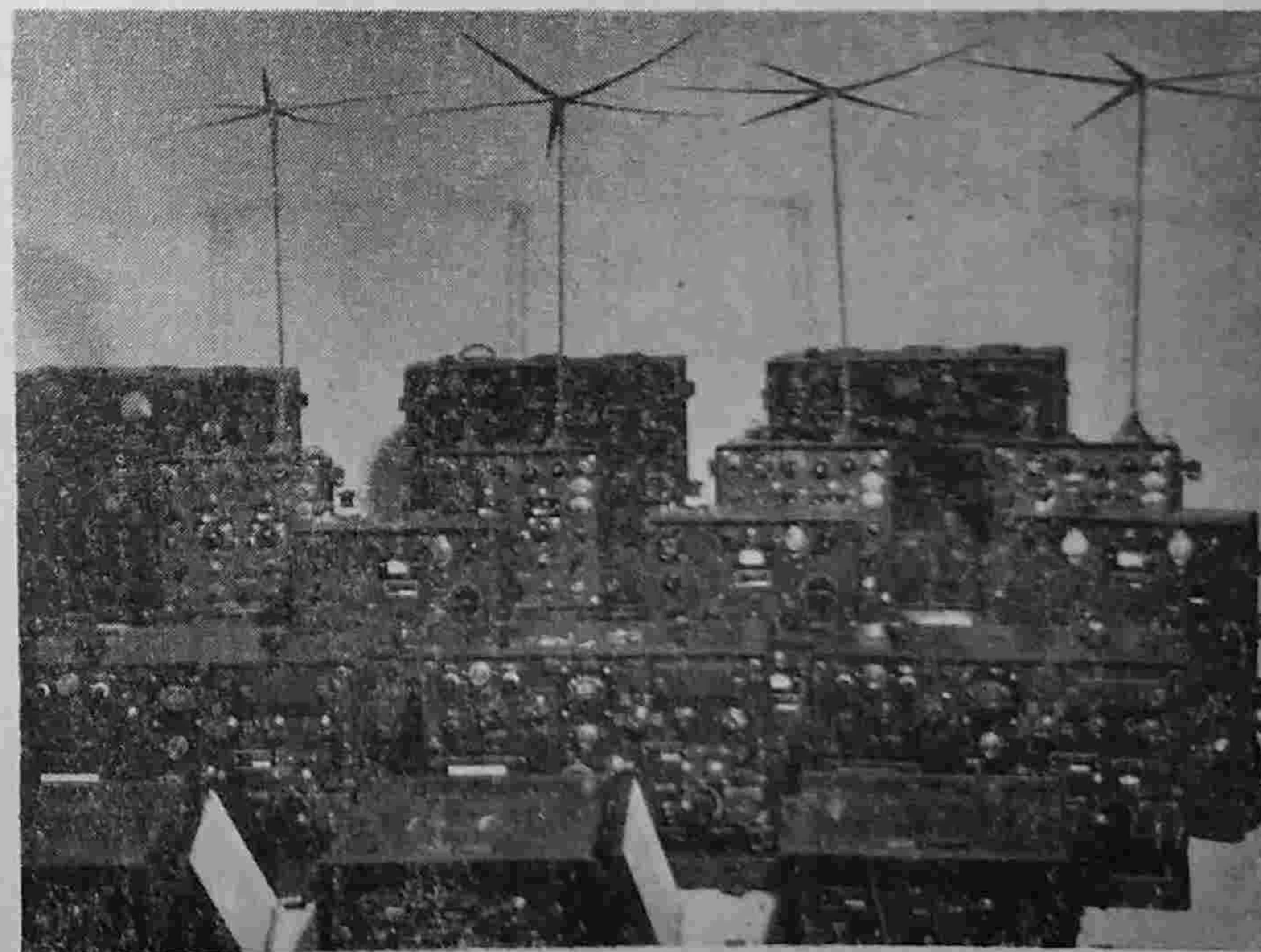


丁：这是在基本指挥点备用的“上海民兵 101 艇”。艇上配备了步、机枪共 38 枝(挺)。这是“上海民兵 101 艇”的照片：



20. 准备叛乱用的电台及联络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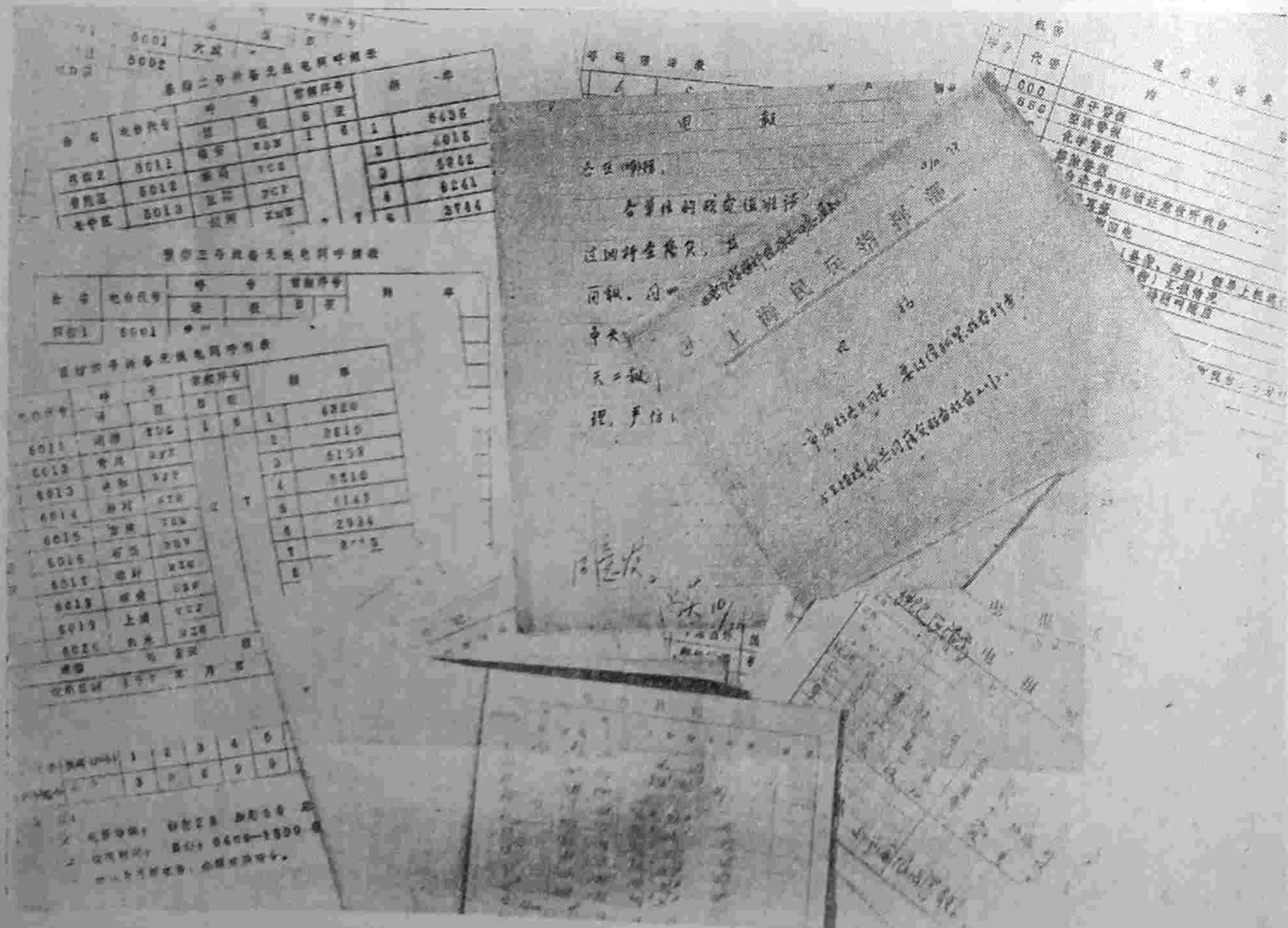
甲、市、区(师)民兵指挥部共开设了十五部电台，组成了两个通讯网，于十月九日十八时构通联络，昼夜通联，收发电报，至十五日一时才停止联络。这是使用的电台的照片：



乙、这是开设电台的位置简图：



丙、这是使用的通报暗语、密码、呼频表、电台日记、收发报登记和电报底稿等：



21. 上海民兵指挥部特兵组组长费海荣关于开设电台问题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十月八日晚，市委王秀珍、冯国柱等人，经过在市民兵指挥部阴谋策划后，于十月九日凌晨二点多，指挥部头头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印玉泉找我和其他二同志，在作战组开会，研究所谓“战备方案”。会上他们定了关于开设十五瓦电台问题，并明确在十个区指挥部、上钢三厂、江南造船厂、中纺机厂开设十五瓦电台（共十五部），组成两个通信网路，每个指挥点（指江南和中纺机）两个台六个报务员，并明确由我和另外一个同志管电台工作。

我到江南厂指挥点，另一同志到中纺机厂指挥点。根据这一决定，我在九日凌晨五点半左右找了有关同志，商量的开设电台的计划，起草了联络文件，抽调了报务人员。下午二点左右，我离开指挥部到了江南厂，忙于架设电台天线，于晚上六点开始与各区（点）电台勾通联络。电台全时收听，收发了电报，一直到十五日凌晨一时才停止。

上海民兵指挥部特兵组
费海荣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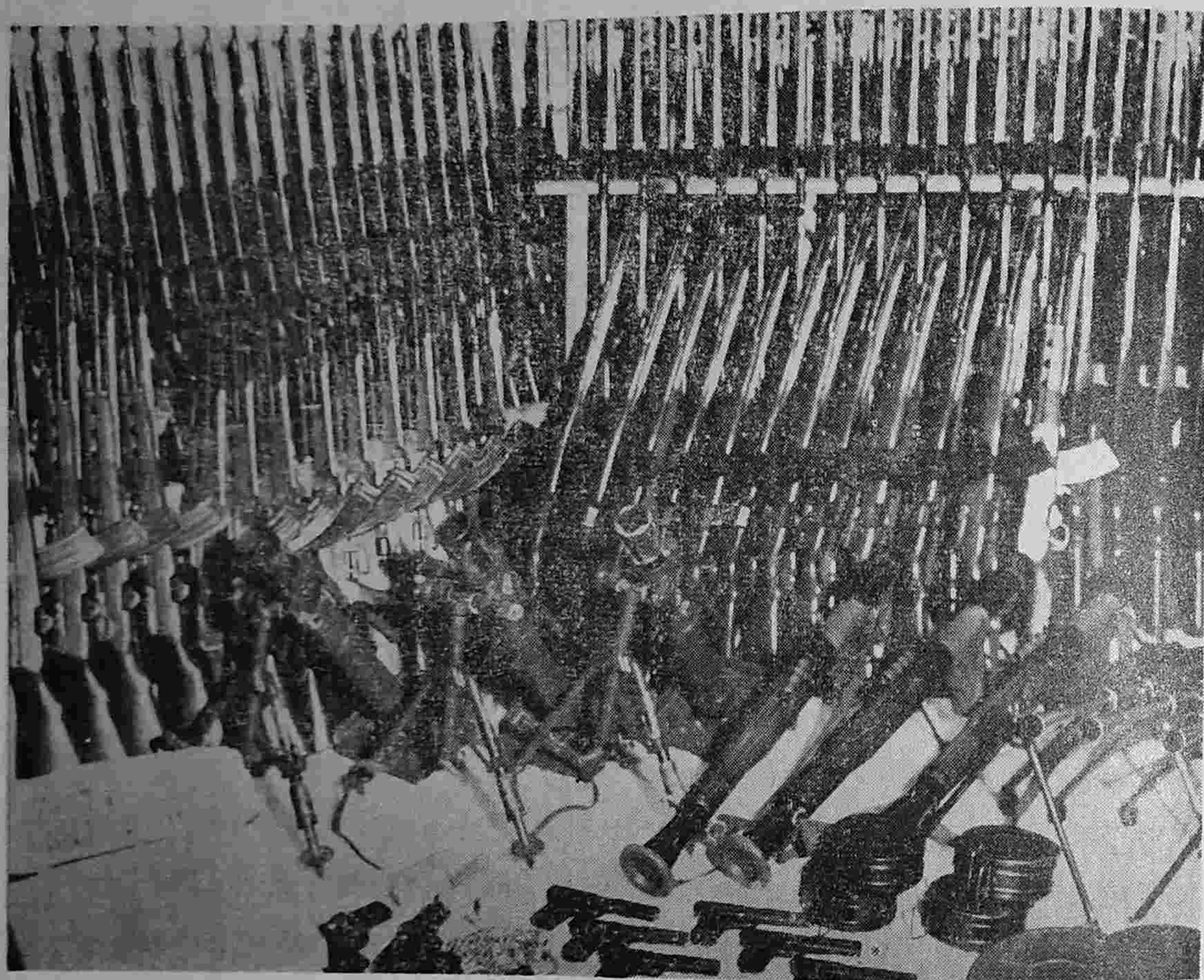
十月八日晚，市委王秀珍、冯国柱等人，经过在市民兵指挥部阴谋策划后，于十月九日凌晨二点多，指挥部头头施尚英、吴立义、钟定栋、印玉泉找我和其他二同志，在作战组开会，研究所谓“战备方案”，会上他们定了关于开设十五瓦电台问题，并明确在十个区指挥部、上钢三厂、江南造船厂、中纺机厂开设十五瓦电台（共十五部），组成两个通信网路，每个指挥点（指江南和中纺机）两个台六个报务员，并明确由我和另外一个同志管电台工作。我到江南厂指挥点，另一同志到中纺机厂指挥点。根据这一决定，我在九日凌晨五点半左右找了有关同志，商量的开设电台的计划，起草了联络文件，抽调了报务人员。下午二点左右，我离开指挥部到了江南厂，忙于架设电台天线，于晚上六点开始与各区（点）电台勾通联络，电台全时收听，收发了电报，一直到十五日凌晨一时才停止。

上海民兵指挥部特兵组 费海荣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22. 准备叛乱用的武器弹药

动用大量民兵武器弹药：炮、火箭筒八十五门(具)，机枪七十八挺，步枪、冲锋枪二万七千余枝，各种弹药二百九十六万余发。

甲、这是准备叛乱用的部分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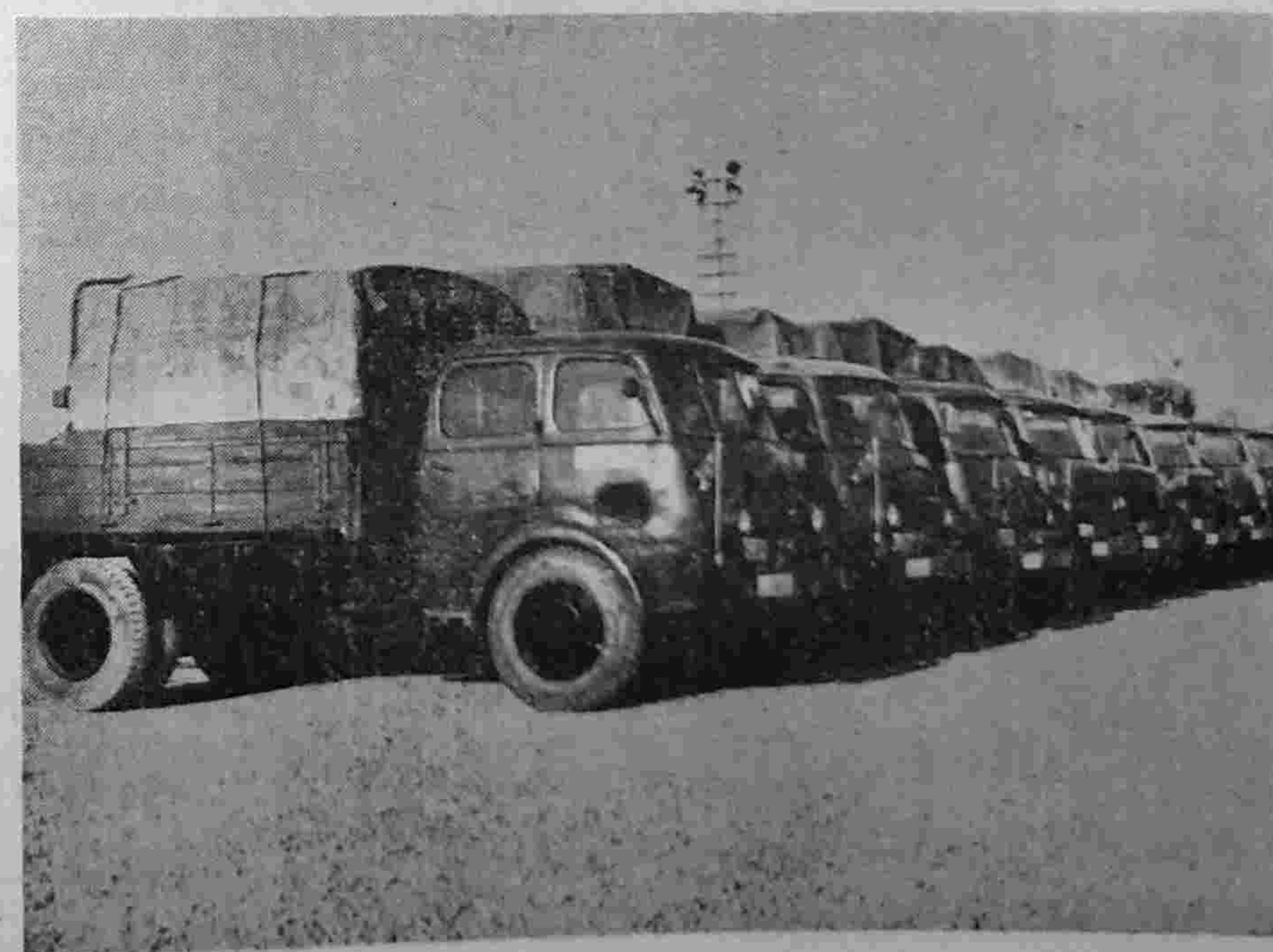
乙、这是准备叛乱用的部分弹药：



23. 为武装叛乱准备的交通工具

为便于机动兵力和通信联络，动用汽车一百二十五辆，摩托车一百辆和一部分自行车。

甲、这是备用的部分汽车：(照片)



乙、这是备用的部分摩托车：(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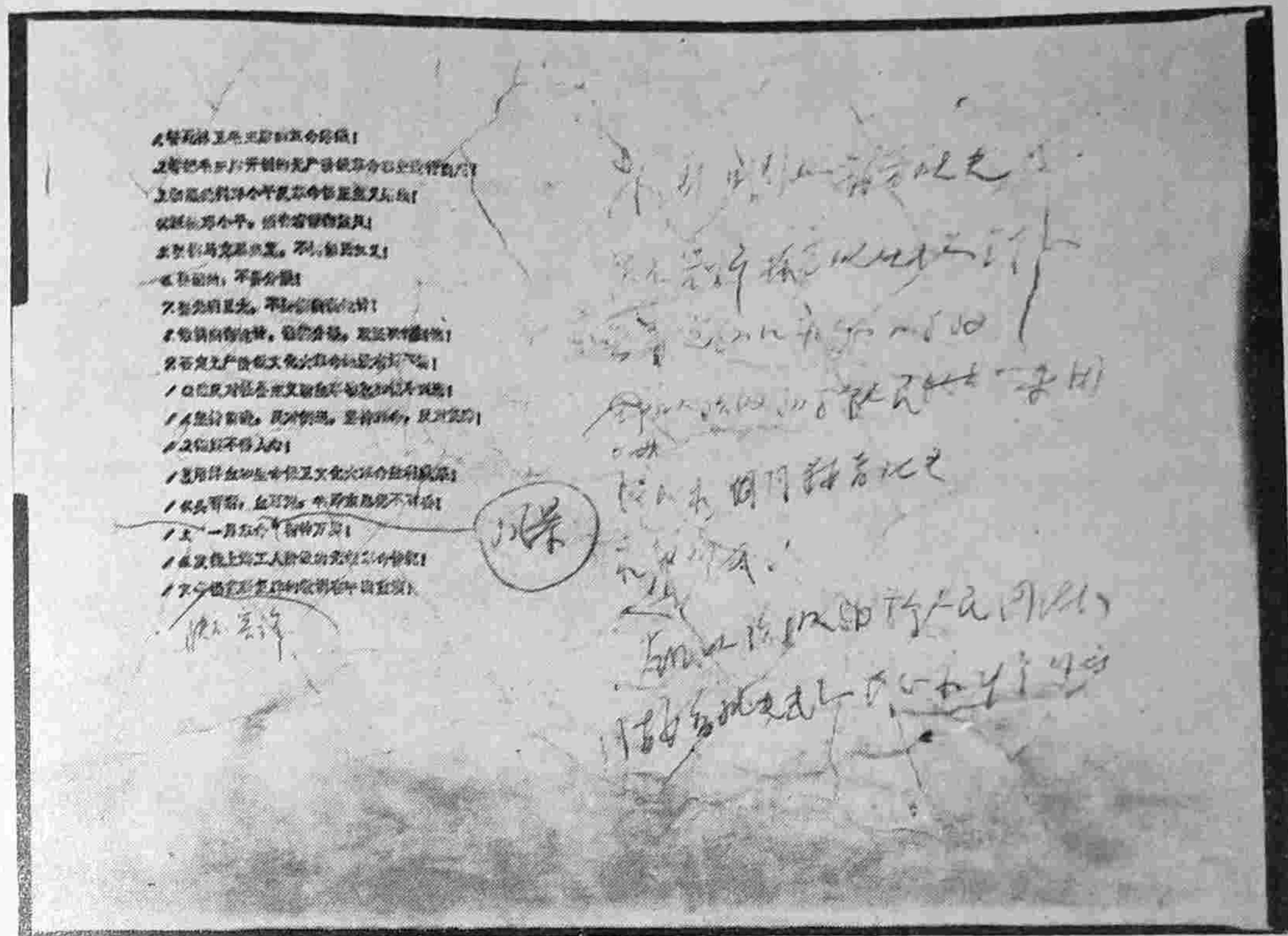


丙、这是备用的部分自行车：(照片)



24. 为武装叛乱准备的标语口号

总工会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和廖祖康等人于十月十二日研究布置起草叛乱用的标语口号。十三日研究修改后，由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一条。这是被撕碎的修改底稿。(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1.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2. 誓死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3. 彻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4. 深批邓小平，痛击右倾翻案风!
5.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6. 要团结，不要分裂!
7.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8. 谁搞阴谋诡计，谁搞分裂，就坚决打倒谁!
9. 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
10. 谁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和他斗到底!
11. 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
12. 翻案不得人心!
13.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
14.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15. “一月革命风暴”精神万岁!
16. 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
17. 决不容许苏联复辟的教训在中国重演!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决不容许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

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

(内部参考材料)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二十)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 一、上海警备区机关与“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斗争的几个片断.....资料组(1)
- 二、杨浦区卢湾区上海县人武部同“四人帮”一伙推行“两部合并的斗争”.....资料组(19)
- 三、金山县人武部同“第二武装”作斗争的一些情况.....金山县人武部(26)
- 四、虹口区干部群众对“第二武装”进行抵制和斗争的二三事.....虹口区人武部(32)
- 五、民兵是听毛主席的
——记上海无线电三厂民兵同“四人帮”斗争的事迹.....孙如堂、杜晓春、蔡期立(38)
- 六、坚持办人民的武装
——记上海量具刃具厂人武部长成浩英同志与“第二武装”的斗争.....徐汇区人武部(41)